

REMEMBRANCE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Aperiodic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记忆》321期

【思想文化】

一代人的精神素质/钱理群

——关于理想主义、集体至上、斗争至上、绝对思维和不知妥协
工农化与“化工农”

——毛泽东时代的制度与文化一瞥（上）/方惜辰
个人崇拜的标志（摘录）/何方

【百年国史】

毛泽东为什么要力推彭德怀“出山”？/谢阳秋

画说我的一生（24）/刘海鸥

——光明与黑暗的较量（1974-1976）

【评论】

季羨林笔下的“老佛爷”/班道超

——聂元梓的打扮、表现、能力和水平

【访谈】

罗征启先生谈“六四”/飞燕采访整理

【述往】

六年芝麻官（二）

——一个县委书记的思考与感悟/李辅
看戏的路子

——中国的京剧与欧洲的歌剧/张保和（美）

【读者来信】

1. 《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主编补正
2. 续霜红纠错
3. 姜学斋谈《记忆》应该学习罗征启的三个 something

【本刊声明】

【思想文化】

一代人的精神素质

——关于理想主义、集体至上、斗争至上、绝对思维和不知妥协

钱理群

我们要反思：这一切是怎么发生、为什么发生的？这也是这些年陆续出版的回忆录和研究著作着重总结与讨论的。它追问到这一代人所受到的教育，他们的理想、信念、伦理、思维、情感、行为方式——等等，其所包含的历史教训，有许多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有研究者将这一代人的精神素质概括为六个方面，即“对理想的憧憬，对精神的倚重，对英雄的崇拜，对道德的敬畏，对集体的皈依，对政治的热情”。¹应该说这一概括是抓住了要害的：“理想”“精神”“英雄”“道德”“集体”“政治”，确实是这一代人生命的关键词。问题是如何评价和对待。有人因为这一代人最终被利用，并且造成严重后果，把他们视为被“骗子”和“疯子”蒙蔽的“傻子”，从而对这一代人的追求与相应的精神素质，予以全盘否定：这很难说是科学与历史的态度。于是又有人（主要是历史的当事人）鉴于当下中国理想、精神、道德、集体观念以及政治热情的缺失，主张对他们当年的追求予以基本肯定，“注入正确的内容，就能重燃政治热情，重建民主意识，重塑理想主义”。²这样的具有现实针对性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似乎还是有点简单化。或许我们应该采取更为复杂的态度：对这一代人的追求与精神素质首先进行严峻的审视和反思，认真总结其中惨重的历史教训；在经过批判性的科学清理以后，再剥离出其中某些可为今天借鉴的合理内核。我们这里要做的，就是这样的初步反省与反思，而且有五个方面。

1. 对理想主义的反思

这一代人的理想主义是有两个方面的问题的。首先是所谓“革命至上主义”。有人回忆说，这一代人“大多有一股原教旨主义的冲动”，心怀“对‘纯粹社会

¹周伦佐：《“文革”造反派真相》，第272页，香港田园书屋，2006年出版。

²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681—683页。

主义’的想象”，³而且坚定不移地相信，唯有革命（而且主要是暴力革命）才是实现这一圣洁理想的唯一正确的途径。这样，他们在将自己的乌托邦理想圣洁化的同时，也把革命神圣化了。于是，就有了“革命至上主义”。研究者说，革命至上就是“把革命的价值看得高过一切，高于物质享受，高于文化、科学、艺术，高于人与人之间的美好关系，甚至高于生命本身”。⁴在这样的基本信念基础与前提下，就引申出两个影响深远而恶劣的理念。

首先是“为革命可以牺牲一切”。我们注意到，文革中许多破坏性行动，例如“破四旧”对文物的摧毁，批判封、资、修对古今中外文化的践踏，破除“旧规章制度”对生产的破坏，鼓吹“划清阶级界限”对人伦关系的冲击与扭曲，“斗私批修”对个人权利、欲望、利益的全面否定和剥夺，以及武斗中人的生命的无谓牺牲等等，无一不打着“革命”的旗号。套用罗兰夫人的话，真的是“革命，革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⁵这样的革命高调对涉世不深的年轻人，特别具有欺骗性与蛊惑性，他们怀着“为革命牺牲”的神圣感、悲壮感，冲在“砸烂旧世界”的第一线，武斗第一线，轻掷青春与生命，付出了令人痛心的代价。

更应该质疑的是“为了革命可以不择手段”“政治斗争（革命）无诚实可言”。⁶文革时期的群众组织中盛行一个潜规则：“大方向对了，一切都对”，只要是有利于革命，“捏造事实，无中生有，造谣撒谎，断章取义，小事扩大，无线上岗等等，均被视为小节，不会追究”。⁷这就尖锐地提出了一个“政治利益与政治道德”“革命与道德”的关系，在政治斗争中要不要坚守“政治道德底线”的问题，⁸更有一个要不要受法律的制约的问题⁹。在更深层面上，则有一个所谓“革命原则与人性良知的冲突”。如论者所说，“对于革命者来说，革命利益高于一切，其他任何一切，包括情感、人性、人道主义，在革命面前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因此才有雨果、狄更斯等作品里“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存在一个绝对正确的人性”这一新伦理的提出。¹⁰文革更是把“革命”推向极端，而将“人

³郑易生：《反思极端思维方式》，《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260页。

⁴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与演变》，第25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⁵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144页。

⁶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522页。

⁷王允方：《求索与启蒙》，《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53页。

⁸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480页，第475页。路小宝：《文革研究的一个新课题》，《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229页。

⁹王允方：《求索与启蒙》，《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96页。

¹⁰王允方：《求索与启蒙》，《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104页，第105页。

性、良知”作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反动思想”痛加批判，极度排斥，就出现了不断“突破做人的底线”的人性悲剧。¹¹在总结文革历史教训时，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出，要从“拷问良知”开始，要重新建立以维护人的良知、人性为核心的新的“道德价值观体系”，¹²这是抓住了关键的。

文革群众政治中不择手段的革命方式就为在中国民间社会本来就颇有传统的流氓无产者、流民文化打开了大门。有研究者就指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兵家的斗争哲学与法家的专制理论与民间流民文化的造反运动相结合”，¹³还有研究者注意到，“从1967年夏季开始”，“社会底层的武术团体，甚至流氓帮伙，逐渐成为各派拉拢的对象。这些人将自己的语言、习气逐渐带入文革社会，特别是这些流民与某些红卫兵在草莽豪爽、蛮横自负方面很快接近起来，形成了深刻影响文革的痞子文化气质”，“显示出文革与痞子社会深层关联的一面”。¹⁴也可以说，文革群众政治和群众领袖中的痞子气，正是民间流民文化传统与不择手段的革命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应该都是文革的负面，很值得注意。

这一代人的理想主义的另一面，是绝对的英雄主义和道德主义。那个时代盛行的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格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责任感，但研究者说的“救世主情结”也是掩饰不住的：“红卫兵们把自己的使命和义务急剧地、无限地放大：君临天下，担当朝纲，救生育民，皆不在话下”。¹⁵问题是，这样的救世英雄的自我崇拜（作为群体就是“群众崇拜”）是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互为依存的，这就意味着这一代人外在的霸气是与内在的奴性纠缠为一体的，还是逃不脱鲁迅早就说过的“对上（领袖）为奴才，对下（芸芸众生）为主子”的中国传统。同样，和前文所说“道德虚无主义”纠缠为一体的还有“高调道德专政”。文革在一开始就提出了要造就一代“新人”，创造所谓“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世界，并提出了“无限忠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等道德高标，占据了道德的高地，而每一个人，特别是年轻一代，都是怀着道德的崇高感、神圣感去投身于革命的。问题是这样的“高调道德”不仅具

¹¹郑易生：《反思极端思维方式》，《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263页。

¹²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政治》，第704页。

¹³汪澍白：《影响毛泽东最深的传统文化四大家》，《毛泽东的来踪去脉》，第314页，自印本。

¹⁴尤西林：《文革境况片断》，徐友渔主编《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第11—12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

¹⁵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第299页。

有高度的同一性、绝对性，是不容置疑的“圣人道德”，而且有极大强制性，与“立四新”同时进行的“破四旧”本身就是一种暴力行为，更有“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思想改造，还有一系列的忏悔、赎罪的准宗教仪式，这确实是一种“道德专政”。¹⁶这样，我们就在这一代人理想中的英雄情结、道德情结里，都看到了专制的内质，这是不必回避的。

2. 对集体至上主义、个体与群体的关系的反思

集体至上主义也可以看作是革命至上主义的延伸，因为革命本身就是一个集体性的，而且是有组织（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行为，它所奉行的是集体利益高于一切、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因而要求绝对服从作为集体意志的集中代表的党的意志，并无条件地放弃、牺牲个人利益。应该说，这样的集体至上、党的意志、利益至上的原则，是早已确定的，对在共和国成长的这一代的影响，也是由来已久的。在文革中自然延续下来，但不是我们这里讨论的重点。

我们关注的是，文革时期由于毛泽东对群众政治的极力推动，我们讨论的“集体”就有了一个新的变化：出现了只接受毛泽东与党中央的领导，不受基层党组织控制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像团派、414派这样的群众组织。在这样的群众组织中，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就有了一些时代与历史的新特点。正如一位团派的成员在回忆中所说，“探讨文革中的群体行为、群体与个体关系是一个既有趣味又有意义的问题”。¹⁷

文革中的群众组织，和之前与之后受党直接领导的群众组织，如工会、共青团、妇联相比，相对松散，个人的参加与退出要自由得多。总体来说，加入某个群众组织，特别是团派、414这样的群众派别，大都是对其政治倾向、主张的认同。但如果深究起来，就有更复杂的内容。一位历史当事人在回答后人的问题：你们当年参与群众政治，以致武斗，动机何在？（在提问者看来，这是“匪夷所思”的）时，这样说：“当时的我们，在理想主义的光环下确实有一种使命感和英雄情结，而潜藏在内心深处的还有某种危机感和改变自己政治地位的强烈诉求。当然，也不排除青年人追求惊险浪漫刺激的猎奇心理”。¹⁸这里特意提到的“潜藏在内心深处”的“危机感”，也是人们在回忆这段历史时经常提到的“恐

¹⁶参看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第303—304页。

¹⁷孙耘：《我的文革心路历程》，《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142页。

¹⁸孙耘：《我的文革心路历程》，《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140页。

惧感”和“不安全感”。¹⁹这是个人完全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极权社会统治下的普遍社会心理，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统治者（毛泽东）意志的变化莫测，政治形势的瞬息万变，个人遭遇的大起大伏，都使全社会从上到下，每一个人都有不安全感，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惶惶不安，以致恐惧中。在这样的社会氛围和心理下，格外突显出个体的孤独与无力，就特别渴望到某个群体中寻找庇护。首先是获得政治的承认：在文革严格的政治等级观念与体制下，最重要的是人的政治身份，参加群众组织，就意味着获得了“革命群众”的身份，有了参加革命的资格，这就有了基本的安全感。而且加入组织以后，这样的不安全感、恐惧感依然存在，也还要争先恐后地表现对组织的忠诚，害怕落后于他人而被淘汰。越是原先的身份（家庭出身，个人历史，社会关系）有问题，在群众组织中越是表现激进，就是这个道理。有人因此说：“文革就是以恐惧为前提的群氓运动”，话有些偏激，但也不是没有根据的。²⁰

在更深层面上，还有利益的趋同：前文谈到文革中奉行“有权就有一切，没权就失去一切”的政治逻辑，自己参加的组织掌了权，个人就成了“响当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也就自然有了一切；掌不了权，或者掌权又失去了权力，个人也失去了一切，甚至有成为“反革命”的危险。这样，文革中的群众组织就成了一个以掌权（而不是政治信念）为中心的利益共同体，个人彼此之间是有一种同生死、共患难的命运密切相连的关系的，这是正常年代很难达到的。这样的文革中的个人对群体的趋同性与归属感，或许是今天这个原子化的时代里的人所难以想象的。文革中极易结成“死党”，不仅是政治观念、理想的同一性，更是利益与命运的休戚与共。而且这样的趋同，在今天还影响着历史当事人对文革的反思，人们很难摆脱当年的派性，客观地看待那段历史。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成员都那么死心塌地地忠诚于自己所属的群体。心存离心力，或者持被动、消极态度的大有人在，有时（特别是在运动中后期）更可能是大多数。“死党”（文革中叫“铁杆××派”）任何时候都是少数。但不能忽视他们的影响与能耐。这就是前文引述的414头头孙怒涛所说，在文革群体政治的派别斗争中，群体的思潮和行为往往受思想最

¹⁹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520页，第529页。

²⁰陈凯歌：《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转引自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第263页。

激进者，特别是偏激的领袖所左右。这就涉及文革群众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它主要是一种街头、广场政治。对这样的广场政治，我有过这样的描述：当无数的个体，聚集在同一个空间下，发出共同的呐喊，“无数个个人的声音融入也即消失在一个声音里，同时也就将同一的信仰、观念以被充分简化，因此而极其明确、强烈的形式（通常是一个简明的口号或歌词）注入每一个个体的心灵深处，从而形成一个统一的意志和力量。处于这种群体的意志和力量中，个人就会身不由己地做单独的个体所不能、不愿或不敢做的事。这是一个个体向群体驱归又反过来为群体控制的过程”。²¹如果说前文讨论的是个体“向群体趋归”的问题，那么，这里提出的个体“为群体控制”的问题，在考察文革群众政治时，或许是更为重要的。

其中三个方面特别值得注意。其一是在街头、广场政治中，最有力量，对群众最具控制力的声音，是把问题极度简化，最激烈，非理性，直接诉诸情感，极具煽动力，因而也最简单、明确的声音，是堂吉诃德式的奋不顾身、勇往直前的登高一呼；而哈姆莱特式的充分考虑到问题复杂性，因而犹豫不决，言辞纠缠难懂，温和、理性的声音，是根本没有人听的。其结果就是每一个派别的观点都被极端化，而失去（或减弱）其合理性，²²而行动更最容易走向非理性。其二，群众之所以听从这样的极端言论，做出“单独个体不能、不愿、不敢做的”非理性的行为，原因就在于所谓的“广场效应”：身处广场（街头）这样的群体空间里，每一个个体都淹没、因而也就隐名在所谓“群众”的茫茫大海里，无须对个人的言行负责，这就是所谓“法不责众”。而言行一旦不受法律的制约，“无法无天”的结果，最后连自己都控制不住，甚至走到主观愿望的反面，产生自己完全不愿意看到的严重后果。这是群众政治的悲剧所在。其三，最严重的，是研究者所说的，在群体的裹挟下，每一个个体的“人性中恶的一面”都被诱发出来，尤其是群众领袖更会“利用他在群体组织的权力地位”，发泄其内心的邪恶欲望，“由群体的公仆变成群体的主人”。²³这样的“文革新贵”几乎是文革群众政治的必然产物。而对每个参与群众政治的个体的人性恶的诱发，或许是更值得注意

²¹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第50页，三联书店2015年出版。

²²一个现成的例子是，尽管414的头头都再三声明，《414思潮必胜》有可认同处，但总的倾向“太右”，是414派中的激进派，不能全面代表414思潮，但人们（包括今天的研究者）都仍然把它看作414思潮代表作，原因即在群众政治中任何派别都在实际上被自己内部的激进派代表了，这是不以当事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参看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头头的心路历程》，第558页，第559页，第565页。

²³孙越生：《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第31页。

的。我曾经说过，每个人的人性本是善恶并举的，在正常的社会秩序，健康的政治生态环境下，就会扬善抑恶，但一旦正常社会秩序被打乱，政治生态环境被破坏，就会是扬恶抑善，导致人性的大堕落，大倒退。不幸，文革正是这样一个人的动物性的嗜杀性恶性发展的时代，这是许多人“不由自主”地投入残酷的武斗的人性原因。这样的“人的动物化”应该是文革群众政治最严重的后果，是文革的最大罪恶。

3. 对斗争至上哲学的反思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青年毛泽东的人生格言，对这一代人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同样后果严重：那个时代的“与天奋斗”，征服自然，越演越烈的结果，是今天大自然对人类的全面报复；那个时代的“与人奋斗”，开启人与人之间无休止的恶斗的先例，至今未歇。这一代人，至少在文革期间，是信奉斗争哲学的，它是文革期间两派内战的思想根源，也给文革中的群众政治打上残酷斗争的印记。其特点有三。

其一，文革时期的斗争哲学是以阶级斗争学说为政治基础的。在毛泽东的“千万不忘阶级斗争”的号召下，这一代所受到的教育就是“时刻提高阶级警惕，随时关注阶级斗争新动向”，对群众组织最基本的要求，也是“紧绷阶级斗争这根弦，充当阶级斗争的尖兵”。这些教育与要求的实质就是研究者所说的，灌输“泛敌意识”，把所有的人都看是“敌人”或“潜在的敌人”，“实际生活中即使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敌人’”，即所谓“‘假想敌’的泛化”。²⁴于是，所有的不同意见，都会上纲上线为“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两派争论自然就成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表现”。由此形成的“用最大的敌意看待他人，处理与不同意见者的关系”的思维习惯，行为方式，以及相应的充满“仇恨”的阴暗心理，影响是深远的。

其二，这是一种把斗争绝对化的哲学，其内涵有二。一是“二元对立”，“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不是朋友同志就是敌人，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只有对立面，而无同一性”。²⁵

二是把一切矛盾与斗争都视为不可调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一个取代一个，

²⁴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第301页。

²⁵郑易生：《反思极端思维方式》，《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264页。

一个吃掉一个。文革群众政治中的两派，激进派和温和派，团派与414派，就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势不两立，有他无我，最后鱼死网破，同归于尽。

其三，崇尚暴力。在文革中风靡全国的毛泽东的这段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²⁶是可以概括文革群众政治中的革命观的，因此，从开始的斗黑帮，破“四旧”，到最后的武斗，暴力是贯穿文革始终的。研究者由此而判定文革是将“灵魂革命”与“肉体革命”统一为一体的。²⁷这不仅暴露了文革空前的残暴性，而且揭示了其“无法无天”，反民主法治的本质。这就是蒯大富说的，“没有法制约束下的大民主，它肯定要变成暴民政治，或者叫什么群众专政”，²⁸这也是文革群众政治的一个要害。人们总结文革经验教训，最后都归结到民主法治建设，建立“民主基础上的法制与法制保障下的民主”，这都抓住了关键。²⁹

4. 对绝对思维的反思

前文所说斗争哲学本身即是绝对思维的产物和表现，这里讨论的“绝对思维”重点又有三个方面。一是论者说的“高举真理的大旗来垄断真理”。³⁰考察文革中两派论争，就可以发现，每一派都不容置疑地宣布自己的观点、主张的“政治正确性”，而且是先验的正确性，实际上就将自己的或许有一定合理性的观点夸大化、绝对化、神圣化，以致真理化了。于是就以真理的代表、化身自居，将真理垄断起来，不仅将不同于己的对方观点妖魔化，而且借助于政治权力，以“政治不正确”的罪名，将对方置于死地。其二，这样的自我真理化的背后，是论者所说的“排斥思想、文化、政治、经济、历史道路等的多样性，否认不同的价值观存在的权利”的绝对思维。其三，这样的绝对思维又是“单一的思想资源、垄断的意识形态、政治的宗教化”的产物。恰恰暴露了这一代人“青年时期的（封闭的，批判“封、资、修”的）教育失去了与传统与世界限制的联系”的基本弱点。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对文革经验教训的总结：“要为自己的理想奋斗，但是警

²⁶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7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出版。

²⁷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第184页。

²⁸蒯大富：《潮起潮落》，《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之一》，第388页。

²⁹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699页。

³⁰孙越生：《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第4页。

惕‘政治正确’的诱惑，不要极端思维方式”。³¹

5. 对“不知妥协”的反思

今天回顾文革期间的两派斗争，确实不能不有许多的感慨：本来，由于政治观点，对社会问题看法不同，以及背后利益诉求的不同，文革中出现两派，是正常的。其实凡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不同的派别，任何社会都是如此。具体到我们这里讨论的清华文革，在团派基本掌握了学校的大权，作为反对派的414派的出现，既是必然，也属正常。而且从理想的政治生态看，如果有一个“负责任的、起积极作用”的温和派的反对派，对实行激进路线的掌权派起一个监督、制约的作用，那是能够促进清华文革的健康发展的。孙怒涛在他的回忆录里设想：“这（将）是一条‘议会道路’（即414参加革委会与团派建立‘联合政府’），是一条对两派都有利的双赢道路”。但这在文革时期，甚至在今天的中国，都没有实现的可能。因为“大权独揽”，绝不和其他政治势力分享权力，是中国的基本国家体制，即使在文革时期也是坚持不动摇的。在独揽权力这一点上，团派和414是一致的，分歧仅在由谁来独揽。而且如孙怒涛所说，“经过文革前的反修教育，认为妥协、让步、忍耐都是机会主义的，都是投降派的所为，只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才是最革命的”。而这恰恰是应该总结的历史教训：“团派和414都不懂得在政治斗争中让步和妥协是必要的，不懂得在争取自己的核心利益的同时，也要从对方的角度设想并照顾对方关切的利益，不懂得一方全胜一方全败的结果只能导向下一次更强烈的对抗并且两败俱伤，不懂得妥协，就会双赢。只想着对抗，必然是零和的结局”。³²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新认识：“妥协是民主政治的真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主政治就是妥协的政治。因为民主讲的是共存，并不是这一派要完全吃掉另一派。要共存，一方面要善于斗争，一方面还要善于妥协”。³³这是付出了巨大代价才得出的结论，弥足珍贵。³⁴

³¹郑易生：《反思极端思维方式》，《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263页，第264页，第266页，第267页。

³²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686页，第690页。

³³陆小宝：《文革研究的一个新课题》，《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230页。

³⁴直到今天，文革群众政治的这些历史教训仍不失其意义。比如“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逻辑仍然在支配着许多人的行为；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依然盛行“以最大恶意看待他人”的敌对思维；在网络空间里，占支配地位的依然是非理性的极端观念和极端思维，非此即彼、非白即黑、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二元对立；把自己的意见真理化，将不同意见妖魔化的绝对化思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一个灭掉一个，不容任何妥协的斗争哲学，更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都已经成为中国新的国民性，形成了一个传统：从文革（还可以追溯到更远）到今天，绵绵不绝，并且已经造成了今日的中国社会民意分裂，国民之间失去共识的严重后果。这是应该引发警惕、深思与讨论的。

【思想文化】

工农化与“化工农”

——毛泽东时代的制度与文化一瞥（上）

方惜辰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的是毛泽东时代对知识分子改造——知识分子工农化，和对工农的改造（“化工农”）。作者将这两种改造简称为“两化”。作者认为，“两化”的理论来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两化”的制度建构是一国两制、城乡二元、三级分层、身份等级和单位制度。知识分子工农化的方法主要是思想改造和体力劳动，而对工人的改造主要是“抬管卡”，对农民的改造则是“管卡压”。“两化”的目的，是用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理想将中国人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两化”的理论创建了新的制度，“两化”的制度创建了新的思想文化，新的思想文化加固了新的制度。制度与思想文化的互动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

关键词：毛时代 工农化 化工农 制度 思想文化

本文讨论的是毛泽东时代对国人的改造。即用共产主义理想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国内论述这一改造的著述很多，通常的做法，一是把制度与文化的改造分开。说制度的只说制度，不涉及思想文化。二是在谈论对国人的改造时，集中在知识分子身上，不涉及工农。本文试图将制度与文化，改造知识分子（工农化）与改造工农（“化工农”）结合起来，对这一历史现象做一综合性的探讨。

为了简便起见，我把工农化和“化工农”称为“两化”。“化”指的是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知识分子的工农化，是为了使之具备“工农”的“三观”和道德品质，融入他们的生活，拥有他们的思想感情、精神和心理状态。³⁵“化工农”就是使工农具备党所要求的“三观”和道德品质。成为忠君爱党、立场坚定、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社会主义新人”，从而获得改造者的资格。因此，工农

³⁵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科拉科夫斯基在四十年前就指出，毛泽东创造了一种“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看来，“生产指标和现代化是次要的，重要是培养能体现农村生活的真正美德和所设想的具备美德的某种新人。”（科斯拉夫斯基，3卷，482页）

化中的“工农”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农，而是被政治化、理想化、纯洁化的工农。

也就是说，在中共的意识形态里，“工农”是一种有着特殊意义、具有特殊使命的政治符号和文化标签。作为政治符号，他们代表着人心，成为政权的合法性的民意基础。作为文化标签，他们代表着“社会主义新人”所应具有新思想、新道德、新风尚。

“两化”以其全面的制度建构推行了三十年，给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和严重的后果，其影响延续至今，与毛时代其他的文化遗产结合起来，形成新的制度—文化传统。

一、“两化”的制度建构

“两化”的基础是以法律法规和党政文件形式出现的，以国家暴力机器为后盾，具有不可抗力的制度。这些制度可以概括为“一国两制”“城乡二元”“三级分层”“身份等级”和“单位制度”。

“一国两制”指的是毛时代实行的，建立在计划经济之上的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享受社会保障和福利。集体所有制有城市和农村的区别。城市的集体所有制分大集体和小集体，在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上与全民所有制有一定的差别。农村的集体所有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公社社员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

“城乡二元”指的是管理城市与农村的方式。主要表现在户籍制度和资源配给上。户籍制将户口分成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城市居民为非农业户口，农民则是农业户口。农业户口吃粮靠自己（生产队），非农业人口吃粮靠国家（商品粮）。“城市户口优越而世袭，农村户口几乎是贫困的同义词。”（李逊，上，4）城乡两部分居民分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在资源配给上，农民在收入、就业、医疗、教育、基础建设等多方面与城市差距甚大。

“三级分层”指的是国家将人民分成干部、工人、农民三个阶层。干部阶层包括各级行政管理者和脑力劳动者（工程技术人员，文艺、教育、医务、媒体工作者等，下统称为知识分子）。行政管理干部实行任命制、终身制和等级制，脑力劳动者实行分配制，终身制和等级制（不同的专业各有级别）。这些人有城市

户口，享受全民所有制的福利。

工人阶层包括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他们也有城市户口，也享受着全民所有制的福利，但是工人不能突破编制，除非被选送上学或破格提干，工人难以进入干部阶层。干部阶层之间，有权力和待遇上的差别。工人阶层之间，则“只有责任和工资的差别。”（李逊，上，5）

农民阶层包括贫下中农和地主、富农、富裕中农及农村基层干部。他们是国有土地的租种者，是各种农业赋税的承担者。农民阶层不准许进入城市就业，不能转成工人，更不能转成干部。

“身份等级”指的是体制身份和政治身份。体制身份的标志是户口（城市/农村）和编制（干部/工人）。政治身份的标志是本人成分、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政治面貌、政治表现。一般说来，干部/知识分子的政治身份比较差，尤其是在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方面先天不足。而工农在这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政治身份的设置提高了工农的地位，但是无法改变户口、编制对工农阶层的限制。

“单位制度”是中国政府为管理社会所创建的一种普遍形式。单位有完全单位和不完全单位两种。两者的区别是社会保障的有无或多少。完全单位包括行政组织单位、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不完全单位指的是农村人民公社。单位是政府机体中的细胞，是政府的委托人，政府将资源分配给单位，单位负责管理和分配。单位的领导由政府（上级单位）任命。

单位具有社会保障、福利待遇、人事/劳动管理和身份认证等功能。社会保障指的是工资、就业、医疗、养老等；福利指的是住房、食堂、奖金、保育、票证等³⁶；人事/劳动管理指的是档案管理、工作分配和调动等事宜；身份认证指的是为结婚、购票、住店、旅行、外联等个人和社会性活动提供个人身份的合法性证明。³⁷

这些制度配套成龙，互相勾连，互相制约，建构了一个全面、立体、层级森严的社会管理体系。这一体系在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的同时，固化了人群，封闭了社会。旧时代所具有的择业权、迁徙权和出版、结社和思想言论自由不复存在。

两种所有制、城乡二元和三级分层为人民公社化奠定了基础。农民为国家工

³⁶ 1955年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命令，1月起军队干部全部实行工资制，7月机关干部也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城镇居民粮食实行定量供应制度。

³⁷ 关于单位制度，本文主要参考李路路、李汉林、王奋宇《单位在改革中的变迁与分化》，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二文，见刘智峰主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报告》第十章。

业化承受着长期的超经济剥削，工人阶级的同盟军贫下中农，与地主富农一样处在几乎相同的生活水平线上。对于长期挣扎在温饱线上的贫下中农来说，政治身份所带来的好处微乎其微。

三级分层和单位制度使干部阶层和工人阶层成为“单位人”（国家的人，吃“皇粮”）。单位在为这些人提供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同时，也将其束缚在单位里。“单位中的就业者不会失业，但也不能随意流动。他们的生老病死都仰赖单位的照料；人们的社会活动也离不开单位，登记结婚、住宿旅店或购买飞机票都要出示单位工作证或介绍信。”（刘智峰，341）单位属于国家，个人属于单位，离开了单位就无法生存。

同时，政治身份又制约了体制身份带来的优越性。挤压了干部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上升空间，压制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对于工人阶层来说，编制的限制虽然阻挡了他们上升为管理阶层的通道，但是政治身份的优越性带给他们的“强助权力”（陆学艺，141），却足以让他们理直气壮地反对“管卡压”。而大锅饭、平均主义、安于现状，无竞争意识导致的低效率成为毛时代的顽疾。

正是这样的制度，为“两化”的长期实施和极端推进提供了保证。有了这样的制度，毛泽东才有了“给饭吃”“给出路”的底气。思想改造才有了依托，上山下乡、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工宣队、贫宣队、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上管改”大学才有了基础。

二、工农化：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知识分子工农化的理论来自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在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吸收本土的思想文化资源，“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结合了起来”，在延安整风中，“创造了一个新的宏大的革命话语系统”。这一新话语不但改变了中国读书人把自己当成“社会中心的传统角色和自我认知”，而且也改变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以启蒙大众为己任的“自我体认”。（高华，166）

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将这一新话语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并推至极端。关于人民与历史的关系³⁸，关于理论与实践、教育与劳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以及他对知识、知识分子、工农的认知和定位，构成了工农化的基本观念框架。

³⁸ 毛泽东相信“人民创造历史”，黎澍对此进行了反驳，见《再思集》，267—268页。

与此相对应的，是全面降低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地位，以阶级出身和政治思想为标准，将他们划入“资产阶级”，减少以至消除他们的社会作用和影响。通过各种运动，使知识分子聚拢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旗帜下，在政治和道德上向工农看齐。让他们的认同以至接受工农的思想感情，习惯以至赞同工农的生活方式。

上面所说的制度建构，为知识分子的工农化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作为“单位人”，知识分子的升黜荣辱都在单位的掌控之中，他们失去了旧时代自主择业的自由。离开单位，也就意味着失去生活来源。

1953年毛泽东与梁漱溟交恶，毛讥讽梁，首先应该降低自己的薪水，因为他的薪水比“九天之上”的工人的工资要多得多（毛选五卷，113）。就是因为梁的工资级别是国家定的，工资是单位发的。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说：“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³⁹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六条办法》的第三条：“大部分不开除公职，给饭吃，给工作做。”（毛文稿，7，101）。1969年，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实行“给出路”政策。⁴⁰ 这类讲话和规定的前提就是上面说的两种所有制。在这种制度下，任何人的饭都不是可以自己挣来的，都是体制给的。工人、农民同样是附在体制的皮上，与知识分子一样，他们同样要在体制中讨饭吃。所谓“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是附在建立这一体制的党的身上。具体言之，就是附在单位/生产队这张皮上，唯如此，你才能有工资/粮票，才能挣工分/分口粮，你和你的家人才能活下去。

新时期以降，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讲述他们在毛时代的际遇遭逢的书刊成为读书界、评论界的一大热点。在人们的感慨中隐含着这样的疑问：知识分子在国民党治下的独立精神和气节风骨，为什么在共产党的治下会丧失殆尽？为什么那时候还有“中国社会性质”和“文艺民族形式”的论战，而毛时代只剩下了“舆论一律”？为什么那时还有鲁迅、陶行知、晏阳初、闻一多和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业，而毛时代只剩下了郭沫若、魏巍、邓拓、傅雷等人和海量的检讨交代？为什么同一个冯友兰，在40年代驳斥了教育部长陈立夫统一教材的训

³⁹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2—454页。

⁴⁰ 196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来驻清华大学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275—281页。

令，⁴¹在70年代却当上了“梁效”的顾问？⁴²……这一万个为什么，都可以从“给饭吃”“给出路”中找到答案。

“从总体上说，毛泽东时代的知识分子对思想改造是赞成、拥护和配合的。他们抱着愧疚心和自卑感，真诚地认为自己应该改造。”⁴³这里面除了意识形态灌输的原因之外，还有知识分子固有的“原罪意识”、民粹思想、爱国主义、“大同理想”⁴⁴以及“堂吉诃德精神”⁴⁵的协助。而以思想改造为主旨的群众运动则强化了知识分子的上述思想观念，加固了制度的合理性。

工农化离不开党内高级知识分子的贡献。1949年5月，范文澜在北京大学发表《谁是历史的主人》的演讲，他在阐述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时说：“过去历史是以帝王为主人的历史，我们今天要推翻它。历史是劳动人民的历史，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⁴⁶这种从著名的历史学家嘴里说出来偏激命题，将来自《联共（布）历史》的荒谬理论普及到知识分子之中，强化了“原罪意识”和“劳工神圣”，抬高、神化了现实中的工农。“谁养活谁”这个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也由此引申出来，搞乱了人们的思想。

当然，个别的反对和抗争是有的，胡风提出的架在作家头上的“五把刀子”都与工农化有关。尽管他在“三十万言”书中，自觉地以《讲话》为指南，批驳林默涵、何其芳（晓风，489—640），但是，他的“‘主观战斗精神’与鲁迅所说的‘精神界之战士’具有相通的精神特质。”（叶炜，11）。他以疗治国民的

⁴¹ “1939至1940年间，陈立夫以教育部长的身份三度训令联大务必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统一考试等新规定。冯友兰代表联大教务会议以致函联大常委会的方式，驳斥了教育部的三度训令。”宗璞《旧事与新说——我的父亲冯友兰》，12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⁴² 详见郭罗基：《“梁效”顾问冯友兰》，德州，美国华忆出版社，2020。

⁴³ 于风政：《改造》前言，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⁴⁴ 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同理想”与西方知识分子的“圣化构想”（the vision of the anointed）有相通之处。“圣化构想”“即与强调经验和审慎的‘悲观构想’相对立的一种完美化的构想。它常常设定一个完美社会的图景来批判现实社会，认为自己可以提供一种出路和解决方案，乃至认为自己或某种制度，甚或某个领袖就是被圣化的个人，将引领社会脱离愚昧而走向纯然的光明。”（见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知识分子与社会》（*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何怀宏推荐序，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⁴⁵ 钱理群认为，知识分子身上有“哈姆雷特精神”和“堂吉诃德精神”，后者“执迷于一种幻觉——一个绝对的，纯粹的真、善、美的理想境界，不惜为之付出一切代价。”“一方面对于超越现实的理想的执著追求”，另一方面，又存在着“精神的迷乱，将书本所描绘的，头脑中想象的虚幻世界、理想人生，当做真实的社会与人生。”《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307、19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⁴⁶ 《进步日报》1949年5月29日，转引自黎澍《再思集》，第269页。黎澍指出，“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说法源于《联共（布）历史》所宣讲的社会发展史。社会发展史认为，只有把物质资料生产者——劳动群众的历史研究清楚，历史才能成为科学。“但是社会发展史终究不能代替或者包括全部历史科学，而且其本身的发展也还有赖于其他历史科学的研究成果。”而研究其他历史科学是离不开帝王将相和其他剥削阶级上层人物的。范文澜的说法，“到十年内乱时，这种误解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几乎普遍认为历史上不应当容许再有帝王将相存在过的痕迹，这才算得是一种最新式的历史观，以至竟对全国文物古迹来了个大破坏。”（270页）。

“精神奴役的创伤”为己任，其“自我体认”仍旧是启蒙大众，理论重点仍是“化大众”（李泽厚，82）。⁴⁷

胡风派的小说家路翎也是抵制工农化的代表，他的《人民万岁》被停演的理由，就是“工人里不应有小私有者思想和流氓思想，那是侮辱了工人阶级。而且不应该让辛辛苦苦培养好的人去牺牲掉了，写革命斗争写到牺牲人，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胡风，609）

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音乐家陆洪恩的反动言论之一，就是“工农兵应该向贝多芬学习，而不是贝多芬向工农兵学习”。⁴⁸ 这些人自然没有好下场：1955年，胡风以“反革命罪”被捕，关押25年。同年，路翎以“反革命集团骨干”的罪名被捕，两次入狱达20年，因屡受电击和强迫服药而痴呆。1966年陆洪恩以“恶攻罪”被捕，1967年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公审大会，被击落下颌后枪毙。

很多研究和回忆都提到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自污。1951年冬，在清华大学开展的思想批判运动中，很多著名教授“夜以继日痛心疾首地当众做长篇检讨，说到紧要关节，有些人甚至痛哭流涕，泣不成声”“从英美留学归来的先生们，重点批判自己如何亲美崇美恐美，如何用腐朽的西方教育方式去毒害下一代”。教理论科学的检讨自己，逼迫学生成名成家而导致其过劳患上了肺癆病。教文科的交代自己“满脑袋封建意识和资产阶级思想，抗拒新事物，反感马列主义，误人子弟罪孽深重。”“潘光旦在检讨‘社会学是为旧社会服务’时，说他过去所研究的性学几乎是在制造海淫海盜的毒药，当即哽咽语塞，而听众报以热烈的鼓掌。”钱伟长在“在机械系讲他的严重个人主义时说，热爱清华大学是因为清华有钱伟长，而且说他在美国与钱学森等人研究喷气动力学是作了帝国主义的帮凶……云云。”学生们质疑：“成名成家怎么能简单地和肺癆病挂钩呢，加强营养和体育锻炼那是可以避免的。作为纯学术领域的性学研究，有助于人类的健康，外国许多大学者都有所涉及，未必都是在刻意制造毒药。”更为学生们不

⁴⁷ 胡风认为，“只有工农兵底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使工农兵底生活成了真空管子。”“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这就使作家脱离了实践。”“革命胜利了不能有落后和黑暗……这就使得作家什么也不敢写，写了的当然是通体‘光明’的，也就是通体虚伪的东西。”“只有思想改造才能创作，这就使作家脱离了实践。”“几年来不但把思想改造成成了军事统制的咒语，闷死了实践的途径，堵死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够进行的思想上的阶级斗争，抽空了思想改造本身，而且使党底威信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胡风选集》第一卷，638、553页）

⁴⁸ 石岩：《中国病人：作曲家王西麟的故事》，载《南方周末》2012年1月12日。1966年陆洪恩因“恶攻”罪被捕，在审讯中，他有长达二十分钟的讲演，其中提到“文革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无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大陆知识分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百度：名人简历：陆洪恩）

解的是，在二战中为同盟国研制武器打击德日法西斯，与八路军的目标一致的，怎么能定性为帝国主义的帮凶呢？”⁴⁹这类夸张的自污节目，在1953年的高校“洗澡”运动中再度上演。当时，周恩来代表党，以劳动人民的名义要求知识分子改造。许多很有身份的教师用很苛刻的字眼来否定自己，“甚至往自己身上泼脏水”（徐葆耕，169）。

五十年代初，知识分子的自“泼脏水”仅限于局部，水平也仅属初级，真正使自污普及开来的是反右派运动。及至文革，包括中共高层的检查交代式的自污遍及全国，而知识分子自“泼脏水”的水平也稳居各个阶层之上。之所以自轻自贱若此，原因之一就在于知识分子的“原罪意识”。

主流意识形态对“谁养活谁”的曲解，使毛时代的知识分子步入了思想的误区。1958年春夏之交，著名的历史学家、北师大校长陈垣在参观了“三大工程”展览后，对工作人员说：“一方面增加了自卑感，觉得自己不如一个普通工人；一方面又感到骄傲，一个中国人的骄傲。”⁵⁰当时大学里最时尚的口号是“做一个无产者，做一个劳动者。”“党中央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口号，使得校园里的学生个个摩拳擦掌，渴望把自己放飞到广阔的生产建设的天地之中去，成为一个‘无产者’。”“有一位女革命知识分子，在总结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时说，自己最初参加革命是要把知识‘恩赐’给人民。后来意识到不对，改为‘把知识奉献给人民’。在经过长期的革命体验后，认为这个认识依然不彻底，应该是‘把知识还给人民！’——知识本来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只是被知识分子垄断了。把本来属于劳动人民的交还给劳动人民——这才是彻底地从精神上劳动人民化了。”（徐葆耕，193）

“从五十年代初的大学里的思想改造运动，到六十年代后期知识分子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从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到乳臭未干的大学生，都自感有罪，自惭形秽。于是忠诚地下乡‘锻炼’‘改造’，以至畸形到承认知识是罪恶、大粪有香味……连中枢神经感知也被‘改造’了。这种‘思想改造’的重要特征恰恰在于它是自愿的，真心实意的，无比忠诚的。”（李泽厚，249）

制度、运动与知识阶层的认知、心态互助互动，使工农化成为毛时代遍布全

⁴⁹ 中英杰在《我与罗兰在大风潮中》，载林贤治、章德宁主编《记忆》（3），42-43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

⁵⁰ “三大工程”指的是宝成铁路、武汉大桥和鹰厦铁路。陈徒手，72页。

国的红色景观。正是在这种语境下，江青对文艺界的荒谬指责就更显得理直气壮：“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⁵¹

工农化改变了自古以来形成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等级制的结构性矛盾，达到了巩固政权的目的。因此，自延安整风至毛时代的终结，知识分子工农化一直是主流媒体的宣传重点。尤其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各级媒体为了宣传“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总要选些典型事例，讲述知识青年在接受再教育的同时，如何将书本上知识与农村的实践相结合，受到了老乡的欢迎，坚定了知青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决心等等。即使在已经放弃了工农化的后毛时代，学术界仍旧以“后三十年不能否定前三十年”为政治导向，努力在理论上为毛时代的工农化找出积极的、正面的理由。

工农化确实给农村带来了些许城市文明，让农民知道了新事物，提高了他们对世界、对社会的认知。一些下乡插队的知青在农村、牧区、兵团担任了中小学教师，为农民看病，确实将文化知识、科学技术和卫生习惯带给了农民。

另一方面，工农化对知识分子也有很多好处。首先，他们感受到了工农的质朴和善良。乐黛云被打成极右，发配到门头沟修水库、垒猪圈、放猪。住在一老贫农家里。“这户农家的老两口……给予她无私的呵护与关爱，这才帮助她度过了饥饿困窘的年代。”⁵²于向真从工厂医务室回到钳工班，“工人师傅的淳朴可爱，干活都不觉得累了。”⁵³张光年“最难忘向阳湖畔一批农民朋友及其少年子弟。他们看得起我们这些落难的读书人，从不把我们看成异类，反而腾屋子给我们，邀我们到家里烤火，教我们一些农业生产知识。”（张光年，6）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把马缨花、海喜喜、谢队长们“最好的一面，勤劳、刻苦、任劳任怨、善良、质相，甚至他们的粗鄙、落后、愚昧、逆来顺受，也被诗意化了。”

54

工农大众同情受难者，知识分子在工农中感到了人间的真善美。体力劳动虽

⁵¹ 江青：《谈京剧革命》。此文是江青在1964年6月23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座谈会上的讲话。6月26日，毛泽东对这个讲话做出批示：“已阅，讲得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1册，89页。

⁵² 季进、曾攀：《乐黛云传》，3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

⁵³ 《军代表门双成》，《记忆》2020年夏季刊。

⁵⁴ 黄子平称张贤亮的这篇小说有着“高度的心理真实”，《沉思的老树的精灵》，154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

然苦累，但是单纯，出一身臭汗，滚一身泥巴，让这些被失眠所苦的脑力劳动者，吃嘛嘛香，倒头便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和农村、牧区的景色空气，对长期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也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因此，知识分子对工农、对劳动、对农村、对草原大都怀抱着美好的感情。从五十年代下乡“三同”，到七十年代的“五七干校”，赞美自然、歌颂劳动的文字如山似海⁵⁵。文化部五七战士们的《向阳湖诗选》中，充斥着这类作品。⁵⁶

工农化也培养了知识分子与民休戚与共的思想感情。清华水利系的大学生到密云水库劳动，“从密云归来后，如果深夜突然天降暴雨，我们会夜半惊醒，眼前呈现茅屋倒塌、农民抗洪抢险的紧张场景；如果炎夏之时多日无雨，也会心情沉重，心痛挑水抗旱的贫苦农民。”（徐葆耕，194）北师大女附中的王平莎、黄光光、张保欣“利用1969年冬回京休假的机会，起草了反映当地挖肃运动扩大化的信件，以神秘渠道偷偷发了出去。”引起了总理办公室的重视。⁵⁷很多知青、兵团战士把当年插队的农村牧区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即使在回城几十年之后，仍旧关心着当地的乡亲们。⁵⁸

与此同时，工农化使知识分子目睹了生活的真相。在四川下乡的樊建川，“至今犹记生产队王家女子，当时已经是十七八岁大姑娘了，端着一个不大不小的二碗，连找几家乡邻借米，均被婉拒后，低头回家的背影。”（者永平，下，580）在平谷插队的赵大年发现了当地的一个新风俗：榜青的时候，已婚妇女、小媳妇都是光着膀子，只有大姑娘胸前还戴个手绢大小的兜兜，好赖遮挡一下。“她们拿不出两块钱来买件汗背心。‘鸡屁股是社员的银行’，小学生双手捧个鸡蛋，到供销社去换三盒火柴或半斤粗盐或一支铅笔……因此他妈妈就只能光膀子榜青，他姐姐就只好戴兜兜了。”（者永平，下，488）

这种与宣传完全不同的真实往往来自工农不识时务的诚实。北京四中请抗日

⁵⁵ 红学家冯其庸有言：“但是三年干校生活我还是有收获的：一是我好不容易有三年的时间回归自然，朝夕与山水田园相接触，如果没有隔一段时间的批判，几乎是陶渊明般的生活了。”宋本蓉整理：《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转引自《记忆》296期人大专辑（2）。

⁵⁶ 《向阳湖诗选》是李城外编的《向阳湖诗草》一书的第三部分。武汉出版社，2010。但是，在这些温馨的回忆和赞美的诗文的后面，却是荒废了光阴，耽误了学业，伤损了身体，落下了病根，缩短了寿命。文革之后，“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成为两代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共同的心声。蒋筑英、罗健夫等中年知识分子奇高的死亡率，《人到中年》的感慨，国家不得不出台的知识分子的年度体检政策，在在说明个体为了工农化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⁵⁷ 张保欣《草原姐妹情》，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原伊和高勒公社知青集体编著《伊和高勒知青记忆文集》295页，自印书，2018。

⁵⁸ 2019年曾在阿巴嘎旗插队的知青马晓莉、刘进、黄光光等14人，在得知内蒙古语文教学改革伤害了蒙族的感情时，给中央写信为蒙民说话。遭到国保的“喝茶”、传讯和上门威吓。

英雄李墨林做报告。李嘱咐学生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学得好当大官坐小汽车，学得不好只能坐大汽车。”校长赶紧把他弄下台。⁵⁹上海育才中学的学生们到松江农村搞“社教”，贫下中农所忆之苦，是三年自然灾害时吃不饱。⁶⁰山东大学化学系请毛主席视察过的北园公社的一位贫农老太太做“忆苦思甜”的报告。老太太讲到动情处，竟然“诉起新社会的苦”。（宋书星，66）何保管告诉樊建川：“解放前顿顿吃米饭，哪像现在红苕都没得吃呀！”地主儿子则对他说，“过去的地主都是勤快人家，靠勤劳节约才买了地。真正惨的是1962年，饿死好多人哟。”（者永平，下，576）在关于毛时代的历史叙述中，贫下中农或战斗英雄在公共场合将新旧社会的苦甜如实道来，而使领导难堪的故事不胜枚举。⁶¹“与工农相结合”使知识分子知道了工农的真实想法和农村的本来面目。

但是，工农化真的改造了知识分子的“三观”了吗？张中行的夫子自道或许可为参照：“改造思想，办法主要是劳动……用这样的办法能够收到改造思想的实效吗？……我问过自己，答案是两个：一轻，是只能改造语言，即作伪，‘说’好听的；一重，是受压，心里不服，思想更加转不过来。”他的结论是：“如果世间有改造思想的存身之地，并且有需要改造思想的情境，首先需要改造思想的正是强迫别人改造思想的人。”⁶² 值得一提的是，工农化在改造知识分子的同时，也给改造者和被改造者带来了很多毛泽东未曾预料到的东西。与民同戚的感情和农村的落后贫困的现实，唤醒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

三、“化工农”：对工农的改造

“化工农”有思想和制度两个层面。思想的层面是将前面所说的“新人”理想落到实处：在文艺作品中大力塑造工农的高大形象，在媒体上大力宣传工农的先进事迹，学校把老工人、老贫农请上讲台“忆苦思甜”，让他们享受革命教育者的光荣和“翻身得解放”的快感。每逢政治运动，工农代表都会被邀请到各种

⁵⁹ 李耿立当时想：“老英雄觉悟不算高呀，应当想着全世界三分之二劳苦大众，怎么想当官呢想坐小轿车呢。原来英雄也是凡人，也有落后思想。”《杂忆之二》

⁶⁰ 听了这种忆苦思甜的学生们“，都感到困惑不解，认为这是少数落后分子的消极态度。”王允方：《求索与启蒙》，孙怒涛：《良知的拷问》，41页，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

⁶¹ 陈桂棣、春桃在《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中谈道，文革期间“忆苦思甜”，不少贫下中农居然忆起了1960年，不是他们对新中国缺少感情，而是那场特大灾难实在太可怕，可以说是惨烈空前。页142，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⁶² 张中行：《流年碎影》，540—54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座谈会上发声，媒体则以“工人阶级说话了”“贫下中农不答应”等醒目标题彰显国家“主人翁”的崇高地位和话语权威。

毛时代思想文化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的高度重视。因此，评选工农兵之中的英雄人物和劳动模范就成为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当选者得到了崇高的荣誉和精神或物质的奖励，记者为他们写报道，作家为他们写传记，他们的照片和事迹登载在各种媒体上，大大小小的单位邀请他们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介绍自己的先进事迹。英模会受到省部级甚至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组成“英模团”到各地做巡回报告。他们还会被选为人民代表，参加人大会议。有的劳模会被送到学校深造，毕业后转成管理干部。有的英模还会被提拔到重要岗位上，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诸如此类的措施，给工农带来了社会尊重。这种高级需要的满足在一定程度上和一段时间内补偿了工农低质量的生活。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以及这一理论中低级需要（生理）与高级需要（尊重和自我实现）之间的关系，在工农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就制度层面而言，“化工农”是为了“巩固政权，从社会各阶层中获得权力合法性的支持。”（陆学艺，141）宪法把工人阶级列为国家的领导阶级，把工农联盟作为国家的基础。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力。党和政府大力提拔、重用工农干部，在高等教育领域实行严格的阶级政策，招收工农子弟。确立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政策，文艺工作者下厂下乡下牧区，电影放映队深入边远山区。在各种运动中，都将工人和贫下中农作为依靠对象。这些方针政策全面提高了工农的社会政治地位。

但是，上述方针政策，并没有从整体上提高工农的文化。“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群众知识化”只实现了一半——知识分子虽然心甘情愿地工农化，工农群众却无缘知识化——吃着“商品粮”“大锅饭”的工人大多数满足于现状。为温饱而战的农民无力也无心于知识化。而那些体制内的工农干部则对知识化一百个不高兴。

夏衍讲过这样一件事：1949年七八月间，他主管上海文教工作时发现，宣传、文化系统的干部普遍存在着“知识水平太低”“常识不足”“知识面太窄”的问题。他“劝大家多读书，多学一些过去不知道的事情，这些话讲了又讲，但是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于是他对宣传部和文化局的科级干部搞了一次常识测

验。“以初中程度为标准，出了五十道题，每题二分，全对者得一百分。”“可是测验的结果却使我大吃一惊，得八十分以上的只有两人，六十分以下的竟占百分之七十，连五四运动发生于哪一年这样的问题，答对的也寥寥无几。在常识问题上闹笑话的就不必讲了。好在我事先考虑到被测验者的‘面子’问题，规定答卷一律不署名。”几天后陈毅市长对他说，“你们文化人办事就是小手小脚，要是我来办，答卷上一定要署名，测验的结果得公开发表，只有让他们丢一下脸，才能使他们知道自己的无知。”就是这样一次不署名的文化常识测验，还成了夏衍的罪过：“想不到后来华东局整风，居然有人慷慨陈词，说我搞‘测验’是‘长知识分子的志气，灭工农干部的威风’！”夏衍虽然不服，但是也只能承认做法上有错误。（夏衍，619）如果他真的像陈毅说的那样，在华东局的整风中，恐怕会遭到更深入的揭批和更严肃的处理。

工农干部对知识化理直气壮的反对，在迎合、强化了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同时，促进、普及了全社会的“大老粗化”。这一正一反，为工农化加了油，使知识化泡了汤。

同是“化工农”，工农之间的差别如天壤。所有制、单位制和户口制保住了“领导阶级”，舍弃了“同盟军”和“主力军”。“在保证城市居民普遍就业权的同时，抛弃了为新中国革命成功作出最重要牺牲的农村地区。”（杨晓民，346）

这一制度设计，造成了梁漱溟所说的“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的现实。⁶³简单地说，对工人是“抬管卡”；对农民是“管卡压”。

1. 对工人的改造：“抬管卡”与“强助权力”

夺取了政权的中共，面临着两大问题：第一，进城以后依靠什么人？第二，如何提高被依靠者的资质。中共知道，以前是农村包围城市，依靠的是农民。现在是城市领导农村，按照经典理论和现实要求，只能依靠工人阶级。对此，党内不乏置疑之声：“过去二十多年革命都是依靠农民取得胜利，而不是依靠工人，今天革命胜利了，为什么又要工人来领导？”“工人阶级并不是天生要跟共产党走的，也不是天生要为共产党的社会依靠。”⁶⁴这类问题的产生说明，中共早期领导的“安源路矿”“京汉铁路”等工人运动已经成为模糊而零碎的记忆，工人

⁶³ 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毛选五卷，108页。1953年8月11日梁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

⁶⁴ 邓子恢：《论华中城市建设新方针》（1949年10月31日），《邓子恢文集》第254—255页，人民出版社，1996。转引自刘亚娟：《再造与自塑：上海青年工人的改造（1949—1965）》，第1页注2。

阶级与共产党无论在地理还是心理上都很遥远而陌生。工人既没有接受共产党作为本阶级先锋队的阶级本能，更没有成为国家“领导阶级”的阶级意识。

1949年3月12日，刘少奇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透露了中共的尴尬：“工人是必须依靠的。但工人是否可靠呢？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是最可靠的。这是一般说的。具体地说，则还有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工作，使工人阶级完全可靠。如我们疏忽，不做工作就去依靠，那是靠不住的。”（刘少奇，下，185—186）这里的意思很清楚：从理论上，中共必须依靠工人。但是要想依靠他们，就必须改造他们。改造的办法首先是抬高——在制度、政策和思想观念两个层面抬高工人阶级。在宪法上把工人阶级设定为领导阶级，用一国两制、城乡分立保护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用身份政治提高其社会地位，增设其社会职能，给予工人以法外之权。同时，建构起一整套关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革命传统和阶级本色的理论。

中共告诉工人，他们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最伟大的阶级，这一阶级具有远大的理想、高尚的品德和光荣的使命——“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也决定了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者。”（中国工人阶级，2—3）

上述使命，盖缘于这个阶级的革命传统：“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信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仰，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坚持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敢于战胜任何艰难险阻的艰苦奋斗精神，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中国工人阶级，2—3）

正是这一传统，赋予这个阶级“固有的阶级本色和应有的思想与道德修养”——“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社会化的大生产与长期生产斗争的实践，培植出工人阶级的坚定性和彻底性、高度的组织性和大公无私等优良品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灌输，使工人阶级这些固有的本色得以发扬光大。这是工人阶级所以最进步、最伟大、最有力量的重要标志。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又形成了国家主人翁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一新的阶级本色。”（《中国工人阶级》，2—3）

对中共来说，这种抬高和拔擢是实用的，空想的，一厢情愿的。对工人来说，这种抬高和拔擢是被动的、钦赐的、名实不符的。研究上海青工的刘亚娟有言：

“中共在她的诞生地——上海执政初始并非就那么得心应手，作为既定的‘依靠阶级’，中共进入大上海之后遇到的‘工人’亦非一个理想的阶级。”“中共在城市斗争中贯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但在实际工作中却遇到‘依靠’与‘再造’需要同时进行的巨大困难。”（刘亚娟，209）换句话说，中共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更像是一种交易——我给你政治名份、经济保障和社会地位，按照党的需要塑造你、宣传你、推销你、展示你。你按照经典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要求为党站台，做党的工具，以“领导阶级”的身分，赋予政权的合法性。

完成这笔交易的平台是单位，手段是级别，将工人变成“单位人”，按照不同的工种定出级别，用考级的办法决定他们的收入。用编制将工人固定在生产岗位上，成为工人转为干部的关卡。如一位鞍钢的工人所说：“工人有天大的本事，也是当一辈子工人”。⁶⁵

即便不能转成白领，当工人也比当农民强得多。工人入党比农民容易，工人中的劳模也比农民多，工人上升的空间要高于农民。工人的子女可以顶替父母当工人。农民的子女除参军、上学之外，永远跳不出农村。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崇高的政治地位，使工人成为婚场上的胜利者。当工人光荣，嫁给工人保险。⁶⁶嫁给农民，尽管是贫下中农、党员，也是一种不明智的选择。⁶⁷

更重要的是，工人手上的“强助权力”——“通过社会强势阶层的支持而增加的权力”（陆学艺，141）。“政府为换取工人阶层的继续支持，对工人的权力行为给予保护。……即使工人的要求在政府看来无理，政府也会安抚或协调，而决不得罪工人。”（陆学艺，141）这表现在所有整人的政治运动中，工人都得到了豁免权。毛泽东对农民常有批评，常强调教育，但是他从来不批评工人，即使在无政府主义泛滥，工人停工造反之时，中共中央也设法将工人与一小撮坏人分开，⁶⁸并把工人中的坏人坏事归咎于走资派。

⁶⁵ 《当前我国工人阶级状况调查资料汇编》，1册，12页。

⁶⁶ 在1982年冶金部、全国总工会、辽宁省总工会和鞍钢组成的调查组提交的《关于鞍钢部分职工状况的调查报告》中谈道：“炼钢厂炉前工人普遍反映，‘解放初当个炉前工很受尊重，感到光荣，走起路来腰板溜直，搞对象得挑挑选选。’”（《当前我国工人阶级状况调查资料汇编》，1册，16—17）。

⁶⁷ 知青楷模邢燕子与农村男青年、党员王学芝结婚，受到了亲友的劝阻。见《人民记忆》，176页。

⁶⁸ 1957年9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的通知》，通知说：“工厂中科室以上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可以划右派，在工人中则只定先进、中间、落后的界限，不作左中右的划分。”“工人、农民中已经划了右派分子的，应当改正。”（《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22册，273页）“1957年11月，上海市委工业部草拟了《关于在工人中划分坏分子的意见》（草案），在全市的整风、反右派斗争中，工业系统的部分企业将4528名工人错划为‘坏分子’。”（刘亚娟，46）《人民日报》1968年2月10日发表《加强社会主义劳动纪律》一文，一方面高度赞扬工人阶级高度的革命精神，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在革命和生产中，充分发挥了主力军的伟大作用。另一方面把停工的责任推给“一小撮坏人”。

“工人不仅可以将在文本规定的法理权力推向极致，而且实际上拥有很多非文本规定的权力。作为主人，可以对作为仆人的管理者进行多方面的制约，包括开展政治运动、写大字报和开展大批判，使其服从工人的意愿。工人参与讨论工厂的重大问题，特别是与工人利益直接相关的工资、福利、奖金问题，要求更多的好处和不受损害。工人抗拒解雇、抗拒惩处，抗拒‘管卡压’，抵制被认为过于严格的规章制度，抵制被认为过于繁重的工作任务。个别工人敢于用脚踹开厂长的办公室，用语言和行动对厂长进行攻击。”（陆学艺，141-142）

陆学艺所谓的“社会强势阶层”，其实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用文革的流行语来说，毛泽东等中共高层就是工人的“强助权力”的“黑后台”。毛泽东“越看越高兴”的“鞍钢宪法”中，就有“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内容。⁶⁹

工厂企业中的“职代会”，也是“强助权力”的组成部分。职代会的作用之一，是“政府希望以此作为联系国家与基层群众的桥梁，上传（意见）下达（指示），将工人群众整合于体制周围辅助行政和监督企业。”（冯同庆，134）1995年，一个老工人在写给工运教授冯同庆的信中对此有具体的描述：“（五六十年代）当领导的不敢横行霸道，蛮不讲理，鱼肉工人、坑害工人的腐败现象极少，三天一个会，五天一个报告，哪一级不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群众发动起来就和你斗，一直斗到你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为止。哪个人都很畏惧，处处讲政策，时时讲原则，哪个也不能搞特殊。工人还能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参加工厂民主管理，建议和改造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还能对当领导的起监督作用。”（冯同庆，67-68）

大跃进期间，“有些企业把计划、设计、技术、管理人员下放当工人，有关管理权限下放给车间、工段或班组，使生产、技术、财务、安全等处于无人负责状态。还有些企业推行‘无人管理’或‘工人自我管理’，搞所谓‘八自’‘十八无’，即工人自编计划，自搞定额，自编工艺，自行设计，自行调度，自管半成品，自行检验，自行统计，无人管工具，无人管考勤，无人发放材料，无人分配活，无人管工序检查，无人管半成品，无人管计划等。有些企业在改革规章制

⁶⁹ 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对《中央转发鞍山市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报告的批语》。这一内容出自鞍山市委提出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两参，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即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即在技术革新的技术革命运动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9卷，89—91页。

度过程中，把所有的规章制度都说成教条主义或压制工人积极性的条条框框而一脚踢开，以致出现所谓的‘十大随便’（上班随便，下班随便，干活随便，吃饭随便，开会随便等）。”（薄一波，下，741）

工人的“强助权力”在文革时达到了顶峰。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1968年8月25日，《红旗》第二期发表姚文元的长文《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把工人阶级抬到至高的地位：文革“唯一的领导者”是工人阶级，“人民群众中最先进、最有觉悟的一部分人”是工人阶级。这个阶级不但有“三

大革命运动的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神通广大：“种种老大难问题，知识分子纠缠不休不能解决的矛盾，工人们一到，很快就解决了。”“比那些目光短浅，只看到自己一个小山头的知识分子，水平不知道高出多少倍。”

工人阶级之所以获得领导一切的资格，是因为他们丧失了自在阶级的资格——经过十七年的灌输教育，他们没有了独立的阶级意识，已经“将党的利益、政权的利益，等同于阶级利益，完全失去了以个体利益抽象出阶级利益的能力。”

（李逊，下，1189）。领导一切的最高指示，使工人阶级的工具价值得到了最高的发挥——工宣队超越了党组织，代替了工作组。工人进驻学校，制止派斗，清队、挖“五一六”、审查干部和知识分子、批斗造反派、上管改大学、领导教育革命，占领上层建筑，成了继红卫兵之后的第二支“冲锋队”。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给予这个冲锋队以最大的荣誉：送工宣队芒果，请万名工人代表入京观礼，部分代表住进了中南海，周恩来向代表嘘寒问暖，邓颖超为代表铺床，代表们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观白天看国庆游行，晚上看烟火，受到毛、林、周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参加国家级宴会……

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6天之后（1968年8月31日），毛泽东又亲自为《红旗》杂志写了编者按：“从根本上说来，走从工农兵及其后代中选拔工程技术人员及其他意识形态工作人员（教授、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路是已经确定的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2册，542）这个编者按不但扩编了“冲锋队”的队伍，而且为工农兵的后代颁发了“铁券丹书”，从根上断了知识分子及其后代的出路。中国工人阶级的声望、地位在20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达到了历史之巅。

然而，“领导一切”很快就露出了败相，第一，工宣队没人领导，成了“三不管”（派出单位不管、进驻单位不管、上级组织不管）单位；第二，工宣队的文化低，不懂业务，无法领导派驻单位的日常工作；第三，不少地方的工宣队轮换频繁，抽强补弱，工宣队成了安排老弱病残工人的休养站。⁷⁰

尽管仅仅是巩固政权的工具，毛时代的光荣和礼遇也足以使“中老工人”⁷¹成为毛忠实的拥戴者。2014年8月，大陆央视在黄金时间播出了48集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吴子牛执导）。在第42集中有这样的情节：1980年，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的几位工人来北京看望当初在那里下放劳动的邓小平。邓小平问他们怨不怨毛主席，一个姓陶的师傅说：“现在有人否定毛主席，我们反对。是的，虽然解放后我们过了些苦日子，但是我们有了尊严，当上了主人，比解放前强多了！”在这部电视剧中，掩饰、歪曲史实的地方多有，但在这一点上是真实的。中共建政后，工人有了“强烈的翻身感”和“主人翁的责任感”，对党、对社会主义有着“朴素的深厚的感情”。⁷²工人们“没有明白，‘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本质上是与‘阶级斗争为纲’相辅相成的，他们‘领导一切’和高于其他阶级阶层的权利地位，只是因为他们的工人身份，是政治名份的附加值，而不是他们的先天权力。如此对体力劳动者的简单颂扬，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贬低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并非真正看得起工人。”（李逊，下，1188）

问题是，事情还有另一方面：工人捧着“铁饭碗”，吃着“大锅饭”，享受着“低成本，高产出的制度安排”⁷³，“习惯于松散的管理，劳动纪律松弛。上班干私活，回家干家务，并以此为‘当家作主的权利’”。⁷⁴“以厂为家”，家里缺什么就到厂里拿。⁷⁵“非无产阶级思想”不乏市场。⁷⁶工人们不但自己对

⁷⁰ 关于工宣队的败相，李逊在《革命造反年代》一书的下册第29章“工宣队的困境”等节中有翔实的描写。这里所列的三条是对这一节内容的概括。

⁷¹ “中老年工人”之中的“老工人”，指的是1956年之前入厂的工人，“中年工人”指的是1957年至1965年参加工作者。1966年以后参加工作的属于青年工人。见《关于当前我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报告》第二节“关于对我国工人阶级新一代的基本估计”。

⁷² 同上，14页。

⁷³ “觉得当工人是件很合算的事情（有工人说：当工人好，自在，不操心，厂长操心，点灯熬油，钱也不多）。”（陆学艺，139）

⁷⁴ 九十年代工厂实行的考勤制、定额制引起工人们的不满：“进出厂要签到，中间也没法回家干家务了，工作又有定额，完不成就扣工资，太不自由了，咱工人还有什么当家作主的权利。”（冯同庆，72）

⁷⁵ 文革中，“有的职工主张‘分光吃光’，‘奖金越多越好’，有的企业任意截留国家资金，截留计划内产品自销谋利，走私、漏税、损大公肥小公；有的职工不爱护国家财产，抱着‘家大业大，丢点没啥的错误思想，挥霍浪费，毫不心疼。有的甚至损公肥私，小拿小摸’，‘家里没有厂里拿，厂里有啥我有啥’。”（《中国工人阶级》，137—138页）

⁷⁶ 1957年，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会曾对15个车间的工人思想状况进行调查，发现“存在七个方面的非无产

读书学文化没兴趣⁷⁷，也不重视儿女的教育。而工人的子女也把顶替父母当工人视为理想的出路。1981年南京市委工业交通部对本市工交系统506个基层单位，44万职工做了思想情况调查。发现“不少老年工人虽然不到退休年龄，身体条件也很好，但只要家中有子女尚未就业，就千方百计找门路办退休。市总工会对几个工厂进行过调查，发现有40多个持有癌症证明办理退休的工人中，仅有一人是真患有癌症的，其余都是通过拉关系走后门弄来的证明。手表厂有一个工人，今年才49岁，身体健康，技术熟练（七级工），孩子户口在农村，每次回家，全家都做他的工作，孩子又吵又闹又求情。最后他只好办理退职手续，让孩子顶职。”⁷⁸显而易见，在工人队伍之中，无论是当父母的，还是当儿女的，都把继续做“领导阶级”视为人生最好的选择。⁷⁹

这样的“社会主义新人”，距离毛泽东想象中的“新人”远之又远。中共宣传部门对工人阶级的努力拔高和殷切期望，在下岗转产和私有化面前沦为新时期的“假大空”。在十大社会分层中排行第八的工人阶层，以其“弱势群体”的整体失落和内部的分化宣告了毛时代改造工人的破产。⁸⁰

2. 对农民的改造：管卡压

中国的农民是人口的大多数，所谓的工农化，主要是农民化；所谓与工农相结合，主要是与农民相结合。按照毛的说法，农民是工人阶级的“伟大同盟军”“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仍然是这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7册，223—224）。但是，毛时代对这个“同盟军”始终实行的是歧视打压的政策。

梁漱溟说“共产党丢了农民”。毛说梁是“代表地主阶级，帮地主阶级忙的”。工农的“差别是有，工人的收入是比农民多一些，但是土地改革后，农民有地，

阶级思想，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1）工作不安心；（2）对工资晋级和生活福利要求过高；（3）劳动纪律松弛；（4）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现象；（5）流氓作风；（6）错误的婚姻恋爱观点和不正当的男女关系；（7）向文化科学进军中的单纯技术观点。”《关于第一汽车制造厂职工队伍状况的调查报告》（《当前我国工人阶级状况调查资料汇编》1册，30页）。《关于大连造船厂职工队伍状况的调查报告》也谈到了这个问题：“由于十年动乱及一度政治思想工作削弱，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泛滥，对老职工思想有所侵蚀。”主要表现政治观念淡薄，责任心下降，计较个人利益。（出处同上，97页）

⁷⁷ 在11个企业接受调查的149,995名工人中，自学的仅有2,228人，占总数的4.3%。《当前我国工人阶级状况调查资料汇编》，3页。

⁷⁸ 《当代我国工人阶级状况调查资料汇编》（3），第38-39页。

⁷⁹ “他们教导儿女多是老实本分，长大了当工人，并不催促他们学习，督促他们进入更高的阶层。”（陆学艺，139）“一汽建厂以来，共有2217名职工子女接班顶替进厂。”为了让儿女顶替进厂，老工人提前退休的占53.3%。（《当代我国工人阶级状况调查资料汇编》1册，54页）。

⁸⁰ 关于工人阶级的整体失落，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研究报告》“专题研究报告之一”，及冯同庆《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第二章。关于工人阶级的内部的分层，见柳可白、王玫、阎春芝著《当代工人阶级地位与作用》第三章。

有房子，生活正在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有些农民比工人的生活还要好些。”⁸¹（毛选五卷，109、111、113）事实上，集体化的农民很快就陷入贫困之中。“1978年全国农业人口的人均收入只有74元，其中1/3的生产队人均收入在50元以下，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当时每个生产大队（平均规模300户）的平均积累还不到一万元，名为‘一大二公’，实为‘一大二空’。有的集体经济单位甚至连简单再生产都维持不了。”（许经勇，34）

农民穷到这种地步，只能归功于管卡压。简单地说，管就是用“政企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把农民控制在“城乡二元”的系统之中，剥夺农民的国民待遇，让他们老老实实地接受“二等公民”的地位，老老实实接受一波又一波的教育和改造。

卡就是用户口、粮票和一系列文件将农民卡死在农村，固定在土地上。不准他们流向城市，避免农民挤占工人的劳动市场，减少城市人口，以减轻供应商品粮的负担。对于那些已经流入城市的农民和家属，则以强制性命令将他们赶回到农村。⁸²

压就是用统购统销垄断农副产品的价格，强迫农民以低价将粮食和农副产品卖给国家。用行政命令强迫基层干部对付农民的抵制，用国家机器对付农民的“聚众闹事”和暴力反抗，以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维持工人阶层的利益，保障城市供应，完成国家的工业化。

在这一环环相扣且不断完善的制度设计下，农民只能生活在“九地之下”。梁漱溟的先见之明在1953年之后，一再得到证实。⁸³

⁸¹ 这是1953年8月11日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到的，毛泽东在《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中对梁的观点进行了驳斥。

⁸² 为了限制农民流入城市，挤占非农业人口的就业市场，1952年8月，政务院做出《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明确规定：“必须做好农民的说服工作”。1957年12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雇用临时工的暂时规定》，作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各单位一律不得私自从农村中招工和私自录用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从此中国多了一个新名词：“盲流”。（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180页）1953年，又出台了《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954年，内务部和劳动部门又发出《关于继续贯彻“劝阻农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955年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和城镇居民按户口供应粮食的办法后，国务院发布《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作为统计的指标，从而形成了二元户籍管理的体制。1956年底，国务院发出《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再次强调不得从农村私自招工。1957年又发了《补充指示》。但这些文件的效果甚微。鉴此，全国人大在1958年1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法律形式上使农民迁往城市的制度固定下来”。（许经勇，30）大跃进期间，各地建厂上项目，招收了大量农民工。1958年至1962年间，国家不得不从三令五申强令上千万的农工返回原籍，并要求家在农村的职工回乡务农。

⁸³ “1960年，粮食实产2870亿斤，比1957年的3901亿斤减少26%以上；棉花实产2126万担，比1957年的3280万担减少35%以上；油料作物实产3405万担，比1957年的7542万担减少一半多；猪的年底存栏数8227万头，比1957年的14590万头减少56%；大牲畜年底饲养量7336万头，比1957年的8382万头减少12.5%。这些农牧业产品的产量都退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的产量仅及1951年的一半。”“1961

对于管卡压的后果，毛和他的同事们是心知肚明的。1953年，提出粮食征购制的陈云说，自己是“担挑着一担‘炸药’，前面的是‘黑色炸药’，后面的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的家伙。”⁸⁴中共中央决定保住城市——避免引爆“黑色炸药”。决定损害农民——点燃“黄色炸药”。随后推行的统购统销政策造成的问题，中央已有预料：“妨碍了生产积极性”“影响生产情绪”。甚至会“逼死人”“打扁担”，以至暴动。（薄一波，上，271—273）

中共坚持这样做的理由，是因为农民需要改造。1949年6月，毛泽东就告诉全党：“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⁸⁵建政后，教育落实到了改造，改造的第一步就是控制粮食。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陈云起草的《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毛最后发言：“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农民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薄一波，上，272）在向农民征购粮食的同时，向干部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⁸⁶，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总路线的实质就是在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名义下，由国家控制经济资源，以巩固政权，推进工业化。换句话说，这个改造就是让干部用国家大局和乌托邦空想去说服农民。

当然，光靠嘴皮子不行，还得有枪杆子。统购统销中“强迫命令、乱批乱斗、逼死人命等现象都发生过。个别地方还发生了聚众闹事的事件。”（薄一波，上，290）按照中共传统的思维，凡是发生抵制的地方，就一定有暗藏的阶级敌人。

“四类分子”及其亲属子女成为“阶级敌人”的首选。对农民的管卡压首先是对这些贱民的管卡压——在管制下劳动，在派活儿和报酬（工分）上盘剥他们。每

年与1957年相比，粮食产量减少了800多亿斤，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和畜牧产品减产也很多。”“1965年的粮食产量3891斤”，基本相当1956年和1957年的水平。1966年略超过1956年。（薄一波，下，913、1082，1292）。文革期间，“人民生活不仅没有提高，而且有所下降。从吃的方面看，粮食人均消费量，1966年为381斤，1976年为383斤，比最高的1956年409斤低28斤和26斤；食用植物油人均消费量1966年为3.5斤，1976年为3.2斤，比最高的1956年5.1斤低1.6斤和1.9斤。”“由于过分强调以粮为纲，经济作物和林牧副渔各业受到排挤，虽然粮食产量有所增加，但整个农业收入减少，而且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席宣、金春明，318—319）

⁸⁴ 《陈云文选》2卷，2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⁸⁵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选》4卷，14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

⁸⁶ 反对粮食征购的不仅来自基层，而且来自县区，以及省部级干部。见薄一波，上，275页。

逢政治运动就对他们行使镇压之权，四清中的“二次土改”，没收地富房屋农具和少得可怜的生活用品。文革期间则对这些人进行有组织地大规模杀戮。

这样一个贱民阶层的存在为改造农民提供了两个功能，第一，它成为处于社会低端的贫下中农的“心理平衡器”。使他们有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心理慰藉。第二，它对农村干部和政治骨干是一种恐怖的警示——他们随时可以成为“漏划地富”或“四类分子”补充进贱民队伍。

对于贫下中农的管卡压，除了上述制度和政策外，主要体现在强行推进“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一“超阶段空想”（薄一波，下，776）中，改造农民的政策上面。

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的三十年中，中共中央为此问题颁布下达了上百个红头文件。其主旨之一，就是用新思想武装农民。1953年，要求各级党委“引导全体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⁸⁷1954年，要求“向广大农民群众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给群众以社会主义的前途教育，推动乡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⁸⁸1955年，是破除迷信之年，毛泽东要用农村合作化“使资本主义绝种”。⁸⁹

与一平二调、一大二公、深翻改土、工具改革、密植并田、浮夸产量、卫星上天、高征强购到来的同时，公共食堂、免费吃饭，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宣教也随之铺天盖地。毛和他的同事们坚信“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当下需要的是“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干部群众”“引导农民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来解决农业社的分配问题和建立人民公社的问题。（薄，下，772—773）

希望共产主义早日实现的急性病，“是共产主义运动代代相传的一种‘接力棒’”。（薄下，794）自从毛泽东接过这个“接力棒”之后，就从战争经验中构想出一种“新式加速器”。他相信，只要给中国按上群众运动和改造思想这两个轮子，就足以“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这个“加速器”在破坏了生态，浪费了大量财力人力，耗尽了大量资源和一

⁸⁷ 1953年2月15日发布的《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20册，46页。

⁸⁸ 1954年1月2日《关于做好粮食统购工作的几点指示》，（同上，237）。

⁸⁹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选集》五卷，198—199页。

时的热情与干劲之后，终于碰到了南墙上——“1960年，大跃进的最后一年，我国的经济已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农牧业产品的产量大都退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的产量仅及1951年的一半。”（薄一波，下，913）尽管中共中央在此后的几年中做了让步和调整，但是国家元气大伤。中共中央明白了，“我们曾经高度赞扬的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不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属于‘合伙平产’的平均主义的‘积极性’。”（薄一波，上，369）而这种积极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土改。

推行公社化的时候，毛泽东信心满满地说：“共产党的话，过去讲的：抗日、打蒋介石、土改、合作社，都灵了，农民相信。这次提出办公社，农民会很快接受。”（薄一波，下，771）经过了饥饿、逃荒、讨饭，断户绝姓，几千万人饿死，以至“人相食”的巨大灾难之后，农民用他们特有的方式抵制了人民公社。

当过公社书记、县主管农业的副书记的山西省特级劳模糜则告诉高王凌，本以为在一个前进的事业面前，不必计较一时的得失，以为很快就会改变，并会越变越好。“可是到了大跃进以后，真正的变化开始出现了。”（高王凌，8）——从1958年开始，农民把对共产党的失望转化成消极抵抗。用中共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的话说则是“避免风险：⁹⁰“其办法，一种是在体制内自己采取一些能吃饱肚子的做法，包括社员和干部互相串通的应变办法，即日后我们所说的‘瞒产私分’，这是一种无权者的抵制。一种是扩大自留地，把一小块土地变成自己的‘避风港’，避免集体化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大试验的风险。”（杜润生，83）

农民抵抗的办法五花八门，“瞒产私分”只是其一。因地制宜，在偏远之地，搞分田到户，⁹¹在边疆临港的则往外跑。⁹²出工不出力、偷盗粮食、借粮、超支、账外账。这些行为是一种集体的，干部与社员共谋的，党员和贫下中农带头的反抗。原主管农业的老干部杜瑞芝说得好：“私分是秘密的，有的连儿子都不告诉。

⁹⁰ 杜润生五六十年代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70年代末80年代初担任国家农委副主任，80年代中期以后担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⁹¹ 如湖南湘中县，“到1961年10月份以前，全县有141个大队1303个生产队实行了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有的干部随波逐流，有的则带头搞。”（高王凌，124）

⁹² 云南的“思茅两个月时间跑了4万人，孟连、瑞丽两县各跑了一半，为全省最多。1958年那次传闻就跑了10万人。”（高王凌，90）广东农民的“逃港”“主要发生在珠江三角洲，特别是宝安、中山、番禺、东莞和新会等。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总数不下几十万人（当时一县人口平均五六十万）。”“据说约有20%的东莞青年偷渡到香港”。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东莞某生产队的两名妇女队长相约数人，驾机帆船外逃。（高王凌，68）

后来就是假集体，方案都是很好的，一般人调查什么问题也没有。对付共产党，这一类的办法是很多的，不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不然的话，活不下去呢，都是掖着脑袋干的。”（高王凌，63）

“根据各方面资料估计，中国‘隐形经济’的规模大约相当于公开经济的20%，也就是说，大约有20%的经济活动，是处于国家的管理和监控之外的。”

（高王凌，169）而这20%的“隐形经济”，还只是对大饥荒以后的计算。事实上，这种经济早在互助组时期就开始了。据1956—1957年的官方报道，“当时瞒产私分的省份已有河北、江苏、安徽、山西、浙江、四川、湖北、贵州、江西、辽宁、黑龙江、陕西、河南、福建、广东、青海等17个省份。”“有偷粮现象存在的省份计有黑龙江、山东、湖北、甘肃、山西、河北、安徽、浙江、四川、江西、辽宁、陕西、青海、广东，共14个省份。”（高王凌，185，187）。

农民想出这些办法，“出发点并非追求发展和本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是维系身家性命，生命安全。扩而大之，就搞包产到户，寻求制度变迁。”（杜润生，83）“事实上农民远非如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制度的被动接受者，他们有着自己的期望、思想和要求。他们一直有着‘反道而行’的‘对应’行为，从而以不易察觉的方式改变、修正，或是消解着上级的政策和制度。这种政府与农民的‘互动’，一直贯穿了整个过程，到今天仍在继续。”（高王凌，192）

自1953年农业互助合作化以来，毛和他的同事们就坚持不懈地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教育、改造农民。这个民亡财尽的浩大的工程持续了三十年，农民不但没有被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反而以他们长期的不懈的“反行为”改造了制度。❏（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正式出版物

陈桂棣、春桃，2004，《中国农民调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陈徒手，2013，《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杜润生，2005，《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北京，人

民出版社。

《邓小平选集》，1993，北京，人民出版社。

冯同庆，2002，《中国工人的历史命运——改革以来工人的社会行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高华，2010，《革命年代》，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高王凌，2006，《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

郭德宏、林小波，2005，《四清运动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郭罗基，2020，《“梁效”顾问冯友兰》，德州，美国华忆出版社。

晓风选编，1996，《胡风选集》第一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何方，2007，《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下），香港，明报出版社。

黄子平，1986，《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1996，《毛泽东传》（1893—1949）（上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逢先知、冯蕙主编，2013，《毛泽东年谱》第六卷（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季进、曾攀，2017，《乐黛云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波兰〕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2015，《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衣俊卿主编，侯一麟、张玲霞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黎澍，1985，《再思集》，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

黎澍纪念文集编辑组，1998，《黎澍十年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城外编，2010，《向阳湖诗草》，武汉，武汉出版社。

李逊，2015，《革命造反年代》（上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李泽厚、刘再复，1997，《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

刘亚娟，2020，《再造与自塑：上海青年工人研究（1949—1965）》，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刘智峰主编，1999，《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报告》，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柳可白、王玫、阎春芝，2007，《当代工人阶级地位与作用》，北京，中国工

人出版社。

陆学艺，2002，《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199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58年1月—1958年12月）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199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60年1月—1961年12月）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199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66年1月—1968年12月）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1977，《毛泽东选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钱理群，2007，《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北大出版社。

宋强、乔边，1998，《人民记忆五十年》，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王若水，2002，《新发现的毛泽东——仆人眼中的伟人》，香港，明报。

席宣、金春明，1996，《“文化大革命”简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夏衍，1985，《懒录旧梦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徐葆耕，2011，《清华精神生态史》，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许经勇，2009，《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六十年》，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杨晓民、周翼虎，1999，《中国单位制度》，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叶炜，2016，《认同的危机——新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研究的一个视角》，北京，燕山出版社。

于风政，2001，《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张光年，1997，《向阳日记》上海，远东出版社。

张英洪，2012，《农民公民权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

张中行，1997，《流年碎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赵园，2019，《非常年代：1949—1978》，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宗璞，2010，《旧事与新说——我的父亲冯友兰》，北京，新星出版社。

者永平主编，1998，《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上下，北京，远方出版社。

《中国工人阶级》编写组，1986，《中国工人阶级》，北京，工人出版社。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文献研究室，1983，《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1981，《关于当前我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报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编，1983，《当前我国工人阶级状况调查资料汇编》（1—3），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6，《刘少奇年谱》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研究室，1988，《“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中下），无出版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9—24册，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内部出版），1986。

非正式出版物

李辅，2019，《六年芝麻官——一个县委书记的实践与感悟》。

李耿立，2018，《杂忆黑龙江的文革狂潮——我的大学后四年》。

宋书星，2005，《云烟未散，文革四十年祭》。

文章

葛元仁，2017，《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需要——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再认识》，《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2期。

金春明，1983，《“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必须彻底否定》，内部材料。

李强、单超，2017，《历久弥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及其当代继承与意义》，《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8期。

李志英，2017，《增产节约运动的来龙去脉及其双面相——基于工业生产领域的考察（1949—1966）》，晋阳学刊2017年第2期。

石岩，《中国病人：作曲家王西麟的故事》，载《南方周末》2012年1月12日。

吴思，2002，《读史随笔：公家田里好长草》，北京青年报，2002年8月27日。

王允方，2013，《求索与启蒙》，孙怒涛：《良知的拷问》，31—118页，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谢忠强，2017，《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增产节约运动研究鸟瞰》，《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3月，第38卷第2期。

于向真，2020，《军代表门双成》，美国《记忆》，2020年夏季刊。

张保欣，2018，《草原姐妹情》，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原伊和高勒公社知青集体编著《伊和高勒知青记忆文集》294-297页，自印书，2018。

中英杰，《我与罗兰在大风潮中》，载林贤治、章德宁主编《记忆》（3），42-43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

网文

裴毅然：《当代中国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矛盾的由来与后果》，2010年5月30日，网文（2016年10月3日查阅）。📖

【思想文化】

个人崇拜的标志（摘录）

何方

一是对领袖的神化、迷信、盲从和狂热追随。为此，被崇拜者本人和他的崇拜者，及其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就要把崇拜对象宣传得一贯正确，无比英明和伟大。还要为他隐恶扬善，伪造历史，食人之功，诱他之过。

二是崇拜对象拥有绝对权威和权力。实际上，所谓个人崇拜就是权力崇拜。权力是个人崇拜的主要基础。共产党里的崇拜对象必须拥有最高的党、政、军权，特别是人事权，对一切人（主要是干部）可以任免奖惩以至生杀予夺。

三是实行一元化领导和人治。个人崇拜不仅绝对排斥民主政治，也使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只能限于口头。因为个人崇拜归根结底表现为体制问题。

四是推行普遍的蒙昧主义。轻视知识文化，禁止言论自由，取消干部和群众的知情权。建立个人崇拜只能利用、加深以至制造群众的愚昧，因而不重视发展教育，不普及科学，轻视知识分子和提倡少读书以至不读书，遍设禁区 and 各方面特别是领导活动的严格保密。

五是允许和鼓励各种迷信言行和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口号。

六是还必须有一系列制度的配套和结合，包括一党专政制、领导职务的终身制或变相的终身制，各级干部的委任制或变相的委任制。传宗接代制和指定接班人制，严格的等级制和法定及非法定的特权制，等等。📖

选自何方《党史笔记》下，489-491页，利文出版，2008

【百年国史】

毛泽东为什么要力推彭德怀“出山”？

谢阳秋

史载，1965年9月，毛泽东力推彭德怀“出山”，任“大三线”副总指挥。先由彭真在大会堂与彭德怀谈，被彭德怀拒绝。9月23日清晨，毛泽东又亲自打电话约见。

与以往大为不同的是，毛显得格外诚恳，说了很多好话。例如：“可不能庐山一分手到底哟！”“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也许对你的批评过了头，或者说是错了……”最后，毛泽东当着后来赶到的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的面，信誓旦旦地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区，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

然而，一个多月后，上海《文汇报》就刊登了姚文元那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打响了毛发动文革的第一枪。毛与彭谈话的3个月后，又当着陈伯达等人的面，说出了那句：“《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一年后，自称是毛的“一条狗”，毛“叫咬谁就咬谁”的江青则用激将法，鼓动北京的造反派头子到成都把彭德怀揪回北京批斗、摧残，相信这也是毛泽东的意思。

那么，问题来了：文革发动前夕的1965年9月，毛泽东为什么要力推彭德怀“出山”？为何在3个月后就有了明显变化？更是在一年之后，又让造反派出面把彭“揪”了回来？还听任造反派肆无忌惮地摧残彭的身体，置之死地？如果不是“衷心诚意”，毛为什么要说假话？他的幕后动机是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

以上这些问题，莫说官方钦定的文革史，即是民间甚至国外有关文革史中也鲜见有提出和分析。为了弄清这个问题，窃以为必须从文革的酝酿到发动这个大的历史框架入手。

1. 饿死数千万人的罪恶需要掩盖。毛亲自发动“大跃进”，造成数千万百姓饿死。对毛来说，这个古今中外、亘古未有的罪恶必须掩盖。如果党内同仁，尤其是接班人刘少奇能够担当此重任，毛原本就无须发动文革。但，从1962年

的“七千人大会”开始，毛清醒地认识到：刘少奇不但不能担当此重任，反而极有可能像赫鲁晓夫那样，会在斯大林死后做“秘密报告”。果真如此，毛的一世英名将毁于一旦。

2. 确定了“倒刘”目标后，怎么“倒”？用什么方式方法“倒”？由于“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采取了一系列灵活的务实政策，不仅在短期内杜绝了大范围饿死人现象，还让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了生机。这让刘在党内，尤其是在高层获得了巨大的拥戴。相比之下，毛又显得格外失败。在这个背景下，采取党内会议方式，合法拿下刘少奇已经绝无可能。

3. 刘少奇必须拿下，但又无法通过合法的方式拿下，唯一的选择就用“非常手段”。或者披上一件漂亮的外衣——“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不让百姓“吃二茬苦、受二茬罪”。

4. 如果剥去一切伪装，赤裸裸的文革主线就是：与林彪结盟，起用新人攻击“旧政权”。党内高层如能配合，那最好；如果拒不配合、甚至抗拒，就和林彪动用军队将其摧毁、灭绝。其时，也正是看清了这一点，周恩来主动向毛、林靠拢；而刘邓则放弃反抗、束手就擒。

至于后来那些声势浩大的造反群众运动，聂元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摆脱现行官僚体制、自行组织的“红卫兵”等，原本并不在“伟大领袖”的计划之内。当然，有了这些，可以让“非常手段”显得更隐蔽一些，冠冕堂皇一些。

说了4条，似乎还没有和彭德怀的“出山”扯上关系。别急，马上就来了。毛泽东历来是主张“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的，那么，发动这样一场规模宏大的文革，即使他事前策划得再周密、准备得再充分，难道就没有一点漏洞？不会出一点意外？

从事后看，刘少奇等人并没有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抵抗，就乖乖的“缴械投降”了。但在毛策划文革时，却不能抱此幻想。不管是毛泽东、江青还是林彪，事前都是抱定了可能“粉身碎骨”的思想准备。这也应了那句话：做最坏的设想，向最好的结果努力。

那么，毛泽东最担忧的是什么呢？发动文革最大的危险又来自哪里？——彭德怀！一旦刘少奇等人察觉到危险，铁下心来对抗，所能做到最可怕的事情是什

么？在毛泽东看来，就是刘少奇重新起用彭德怀，利用彭在军队的巨大影响来压倒林彪。利用刘主持中央一线的有利地位，名正言顺地给彭德怀平反，用合法手段撤销林彪主持军委工作的职务。刘少奇果能做到这一点，毛泽东危矣！林彪、江青危矣！

毛泽东事前能够防范的，一是行动尽可能隐蔽，不到关键时刻不能让刘少奇等人有所觉察、有所警觉。第二就是尽可能把彭德怀赶出北京，让他在通讯、交通都极为不便的大山窝里转悠。届时，即使刘少奇等人有所警觉，能找到彭已是十分困难，更别提在一起商议、谋划军国大事了。

当然，对毛泽东的意图，刘少奇并没有足够的警觉。即使他感觉有些现象不正常，也相信最终还可以在党的会议上得到解决。他哪里想得到，毛根本就没打算在会议上解决分歧——他是先将对手置之死地，然后才开会议确认的。所以，刘少奇也就失去了他唯一可以避免家破人亡的机会。而彭德怀则完全被蒙在鼓中，稀里糊涂地做了一年“副总指挥”。一旦毛泽东得手，完全排除了刘少奇反抗的风险，就是把彭重新“揪回”北京，关押、批斗、摧残直至肉体消灭的时刻。

行文至此，应该可以清晰地看出了毛在文革前夕，力推彭德怀重新“出山”的目的所在；也只有这样解释，才合乎毛既言之凿凿“衷心诚意”，又在暗地里把彭当作文革靶子的内在逻辑。换句话说，毛泽东根本没有启用彭德怀，让他重新“出山”的打算。毛在文革前夕这一番操弄，只不过是在发动对刘少奇等人的全面进攻之前，为防止刘少奇“勾结”彭德怀所采取的一项防范措施。他对彭德怀所说的那些“衷心诚意”的话，不过是为了哄骗彭德怀接受并尽快离开北京的弥天谎言。

可怜彭老总，只因看到了民间疾苦、百姓疾苦，为民请命，因而得罪了毛皇帝，导致自己后半生令人唏嘘的悲苦命运。诚如那位规劝袁绍不要伐曹的谋士田丰——袁绍胜了，尚有可能被赦；一旦袁败，更显田对，那就更会死无葬身之地了。与此类似，假如“大跃进”没有导致大饥荒，没有饿死数千万普通百姓，毛尚有宽待彭的一天。而一旦实践证明彭对毛错，那毛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宽待彭德怀的。在毛的眼里，彭德怀只能是被“关死”“折磨死”的对象——尤其是在文革无法无天、毛的每一句话都被视为“最高指示”也就是“金口玉言”氛围下，彭是绝不可能会有第二条路的。📌

【百年国史】

画说我的一生 (24)

——光明与黑暗的较量

(1974-1976)

刘海鸥



1975年春节我和妈妈去广州。妈妈从干校回来后，每年都要去广州和老同学及十二集团军的老战友聚会。我们住在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杨重华的家里，他的女儿小欣整天陪着我，有一天她告我有个朋友聚会，让我也去参加。

到了朋友家，已经有几个人，有些神秘，关好门拉好窗帘，打开录音机，播放一个讲话录音。一个人给我介绍讲话者是“李一哲”中的一个人，李一哲是三个人——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各取名字中的一个字，合成一个名字。这三个人是广东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在1973年11月7日写了一份两万六千言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批判某党建国以来破坏民主法治的种种行径，反对集权政治。一大批像小欣和他的朋友一样的热血青年追随李一哲，最起码也是赞同他们的观点，这让广东省革委会非常惊慌，组织了写作班子“宣集文（宣传部集体作文）”，并发动全省各单位对李一哲展开针锋相对的大批判。

他们送给了我许多阅读材料，论战双方的都有。李一哲的文章援引马克思主义经典，有理有据，鞭辟入里，痛快淋漓并且文采非凡。而“宣集文”则秉承“两报一刊”的风格，连篇累牍的空话，帽子，叫骂，水平低下。

我十分佩服李一哲们的水平，并且承认他们说得非常在理，但是我也很彷徨：我这些年拼命往脑子里灌输的东西和他们的理论正相反。我应该站在哪一边呢？我把这些材料带回家细读。无论怎么读，都觉得李一哲说得对。就在那几年，我对文化大革命，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党和领袖都产生了疑问，人们在下面偷偷议论，我很爱听，但行动上还是相当谨慎。

李一哲们1975年被抓，1978年释放，其中一个多次抓放，几十年后到了美国，已经是一个头发全白的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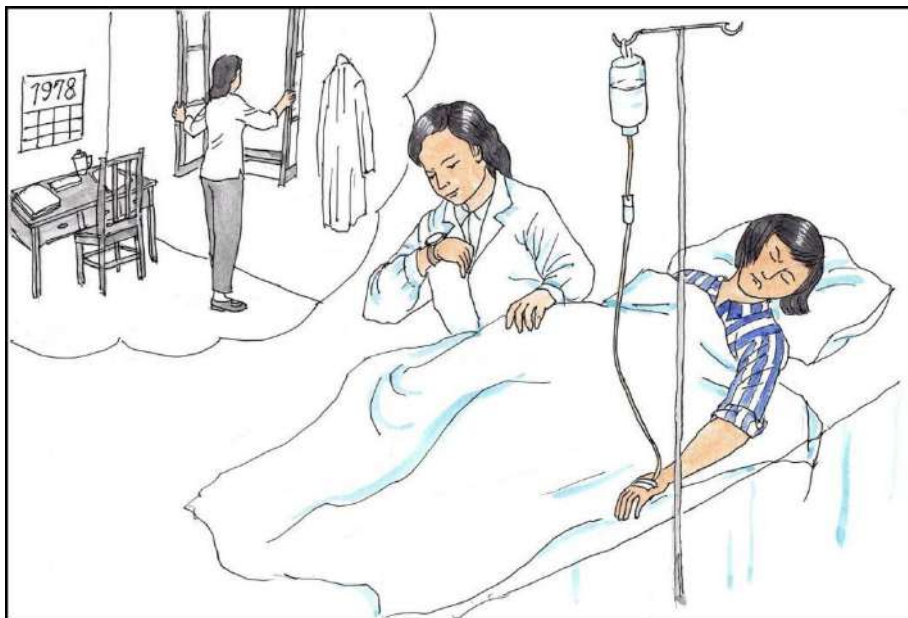
1976年是中国共产党史上的又一个多事之秋。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去世，全国上下都陷入深深的悲哀之中。因为上层的争斗，对于周恩来的祭奠非常低调，引发了人民群众的不满，清明节之前，人们到天安门广场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自发地组织了大规模的悼念活动。整个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人民英雄纪念碑下花圈堆成山，花圈上和纪念碑上贴满了人们写的挽联诗歌、散文和小字报。无数人聚集在纪念碑周围念诗，演讲，喊口号，表达对总理的歌颂和怀念之情，痛斥王张江不断地发起一轮又一轮的运动，把中国推向危险的边缘。

我们一家都十分激动，天天去天安门广场观看，妈妈抄录了好多首诗歌，装

订成册。海燕写了几首诗贴在纪念碑上，她的诗立刻被人们广泛传抄。“四人帮”倒台后，有人编辑了《四五天安门革命诗抄》第一页第一首诗就是海燕的。当时海燕和多数人一样不署名，书上的作者是“佚名”。我已经怀孕七个月，也大着肚子去看了天安门的盛况，还照了相留念。

4月5日晚间，北京公安、卫戍部队、“工人纠察队”冲进天安门广场，见人就打就抓，花圈没收，诗抄撕毁。有上千人被捕，天安门广场被清洗一空。群众的悼念活动就这样遭到了暴力镇压。这就是有名的“四五天安门事件”。

天安门清场完毕，中央又下发文件，要求各单位清查曾去过天安门的人名单，收缴所有天安门诗抄，情节严重者送交公安机关。那时“中央文革”的权势已经是强弩之末，“四五镇压事件”可以看成是它们的垂死挣扎。对他们的作为，人们的心里像明镜似的，都感觉社会将会发生大的变化。各级领导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卖力地执行“中央的指示”，只是一般地问问有没有人去过天安门，如果否认，便不再追究。我校的领导也是这样“阳奉阴违”，在开会时只是提了一句，让去过天安门者及有诗抄者向领导汇报，就没有下文了。我和很多人讲过天安门的见闻，包括校领导，他不仅没有追究，还在下面和我偷偷讨论有关上面的小道消息。



婚后两年我一直没要孩子，我不想那么快就生小孩，结婚已经束缚了手脚，有了孩子更没了自由，但是老宋非常想要，他是他家老大，似乎总得有后才对得住父母。他虽然不说，但心里很急切。这让我经常有负罪感，我觉得自己有些自私，终于决定生孩子，主要是为了他。

1976年的6月18日，儿子出生，叫大田。生大田的过程真是艰难，预产期到了回家等待，谁知过了近两周，他老人家还是没有动静。一天我正在大幅度地拖地，想让他快点出来，羊水破了，妈妈马上和我去了全市最好的妇产医院。医院说孩子必须尽快生下来，因为过期不生会因胎盘“老化”而导致胎儿夭折，而且羊水破了孩子随时都有可能窒息。

住院后，医生给我用了各种引产方法：吃药，喝蓖麻油，电针刺激，均无效，子宫就是没有收缩，只好采取危险的一招——使用催产素。催产素通过点滴进入身体，我立刻有了强烈的宫缩，把我痛得死去活来，这种强迫性的宫缩轻重节奏掌握不好就会导致子宫破裂，所以主任医生黄九妹亲自坐在我身边，手按在我的腹部，检查宫缩的程度。终于，大田在晚上八点钟降临人间，七斤八两重。

他一来到产床，小身体挨着我的腿，我就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一个生命的质感，立刻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我从此有了责任，有了挂牵。第三天我才见到大田，那么大的眼睛吓了我一跳，所有新生儿几乎都是一对眯缝眼，几天张不开，而大田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白蓝蓝的。别的产妇都羡慕地说，这个小孩长得真漂亮。

黄九妹大夫给我的印象很好，四十岁左右，上海人，医术高，敬业，严厉中带着亲切。两年以后，中国23年来第一次上调工资，但名额有限，由群众评议，领导拍板。黄大夫没被评上，宣布的那天她照样上班，为一个个产妇接生婴儿一直忙到晚上。下班后，她安安静静地脱下白大褂，穿好衣服，然后推开窗子，从六楼跳了下去，一个有前途的医生就此断送。



我在妈妈家坐月子。很多烦心事都聚集在一起：七月底的天气特别反常，闷热潮湿，阴沉沉的，压在头上让人喘不过气来。我的奶水不多，流得又不畅，大田吃几口，吃不到什么，就大哭大闹。想到五十六天的假期很快就会过完，那时肯定要停喂母乳，不如早些停了算了。我吃了回奶药。

自从地震局成功地预报了东北海城地震后，从头年十二月起就在各个单位传达京津唐地区将有大地震，让大家做好准备。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抢购大米面粉和各种生活用品，以备地震之需。妈妈也买了很多饼干，灌了几瓶水放在桌下床底。我认为这是十分荒唐的事，地震是无法准确预测的，这样没边没沿地做准备，要等到哪年哪月？时间长了，北京的老百姓听“狼来了”的呼声听多了，也都松弛下来。就在这时，“狼”真的来了。



7月28日的凌晨，大田又醒了，没了母乳，他无依无靠的，哼哼哧哧地哭。我喂了他几口水骗骗他，他抽抽噎噎地又睡去了。我把他胸前的米袋摆好（一条宽布带，两头缝上米口袋，布带盖在孩子身上，米袋在身子两旁，以防止新生儿睡觉时手脚乱动），把小床栏杆拉起，掖好蚊帐。此时，房顶上的老鼠像炸了窝，排着队，蹬蹬蹬从东跑到西，又蹬蹬蹬从西跑到东。耗子的闹声，儿子偶尔的抽泣，还有屋子里昏黄的灯光，让我心里感到一种悲凉，那一晚上我记得非常清楚。

三点多钟，我被老宋急促的叫声吵醒了：“海鸥！海鸥！”他那天恰巧来看我和孩子，被妈妈喊醒。几十年神经衰弱的妈妈第一个觉察到地震，疯狂大叫，

唤醒了全家。我睡得那么死，如果老宋没来看我，我还不知在那个爪哇国里。

我的床在猛烈地上下震动，黑暗中有一种可怕的轰鸣声。这与1966年我感受到的邢台大地震不同，那次是左右摇摆的感觉。这次地震来势凶猛！我一跃而起，冲到小床前，抱起了儿子，连同米袋，连同蚊帐，和老宋一起冲出屋门。

妈妈和刘元已经站在外面。我家住在西跨院的耳房里，耳房正对着西屋的山墙，我们半睡半醒，半醒半懵，站在山墙底下哆嗦着，还没有回过味来。地下继续发出沉闷的轰鸣，地面先是弹跳着，然后又像风浪中的甲板歪斜着，我们随着大地摇晃。



突然，头上在掉土，越掉越急，夹杂着小碎砖块。转眼碎石烂沙如下雨般落下，不知谁喊了一声“山墙要塌！快跑！”妈妈和刘元冲出小跨院与正院相隔的栅门。我和老宋头顶头颈交颈胳膊环绕着，把怀里的婴儿严严实实遮住，像个连体人一样挪向栅门，山墙上开始掉大块砖头，砸在我们的头上脚上。栅门被掉下来的石头绊住，拉不开了！情急中，宋抬脚猛力一踹，门开了一条斜缝，就在我们俩奋力挤出栅门的半秒间，轰隆一声，山墙轰然倒塌，砸坏了栅门，碎砖盖了跨院，飞进了我们的屋里。

生死竟在瞬间。

半秒钟的时间赢得了三条性命。首先想到的是大田，他有没有受伤？他在老

宋的怀里纹丝不动，我感到不好，喊了几声，没有一点反映。天黑，看不清。我们跑进西屋邻居家在灯下仔细观看，儿子的头脸像个土葫芦，襁褓也全部盖满灰尘，额角一丝细细的血流正在往下淌。我的心已停止了跳动，老宋简直要哭出来。他小心地吹去儿子脸上的灰土，在我们的狂喊中，儿子动了动，巴巴嘴，又睡了，样子很恬静。除了额上小小的擦伤，他没有事！

西屋的小四见到我们，惊恐地喊起来：“二姐，血！血！”我这才感到，头顶上正在汨汨向外淌血。血流过我灰尘蒙面的脸，流到胸前，染红了整个胸襟，又往下染红了裤子。宋也一样血流满脸。

那阵小四不学好，流里流气，偷东西，见了我早已经不再打招呼叫姐姐。可是这会儿，他急忙给我找了一块手绢，男人的有点儿脏的手绢，帮我捂在正在流血的头顶，关切地让我坐下。北屋的三福妈也不示弱，非要拉我们上她家去坐不可，理由是她们家更安全。邻居们平时为了一两分钱水电费常常闹得你死我活，这会儿表现出了空前的爱心，我真是很感动，但是我们哪家也不能留，我们必须马上去医院治疗。



我们去离家不远的隆福医院，走路时我发现我的脚也受了伤，一瘸一拐，行动困难。天还早，街上没有什么车。路上有很多人躲地震，他们集中在马路的中心，远离路边的建筑物。有人发现了我们，张口结舌地指着，啊啊地说不出话来。我们的样子肯定很可怕——在朦胧黑暗中行走的血衣，上面架着两颗血葫芦。



到了隆福医院才发现，我们的伤势不算什么。急诊室里已经挤满了伤员，砸胳膊断腿的，血肉模糊的，哭天喊地的，不省人事的。一位母亲背着比自己矮不了多少的孩子，飞奔而进，大声哭喊着：“大夫大夫，救救我的儿子！”孩子趴在她的肩上脑袋耷拉着，可是医院的值班大夫根本不知道在哪里。看到这般情景，我说：“回去吧，轮不到咱们。”



回到家一会儿，不知谁把“红医站”（那时每个胡同都有一个红医站为本胡同的居民治头疼脑热，还管打针发药）的老太太找来了，她给我们头上抹了一点紫药水，盖上一块纱布，拿绷带裹巴裹巴。

余震频繁，人们不敢在屋里待，都站在院子里。院子太小，躲过这边的房子，就靠上了那边的墙壁。站在哪都不合适。我们决定天一亮就回自己体院的家，那里到处是大操场，避震容易一些。当我们头缠绷带，穿着血衣，抱着孩子坐着蹦蹦车（三轮摩托出租车）回到体院家属宿舍时，在外面避震的人们都震惊了，赶紧把我们拥到医务室重新消毒包扎打针。我们的头被纱布结结实实地缠起来，就像电影里的伤兵。

天开始下雨，体院理论系的人都转移到教学实验楼躲避。这个教学楼是五十年代末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建筑的，和苏联的一切东西一样，虽然粗笨，但是结实。我们受到特别照顾，三个人分到一间教研室。

雨越来越大，多天来堆积的厚厚云层全部化为雨水，终于像决了口一样从天上狂泻下来。雨水密得看不见任何东西，只有惊天动地的雨声和雨幕包围着你，好像面临洪荒时代，整个宇宙即将天塌地陷。我们感到恐惧，不知道下面老天爷还要干什么。

有消息传来，地震中心在北京东南的唐山，整个城市全变成了一片废墟。更可怕的是医务室杨大夫的丈夫和妹妹大哭着从唐山回到体院，带来了杨大夫在地震中遇难的消息。地震的前一天，体院有一辆车去唐山拉货，杨大夫夫妻和杨再春老师的家在唐山，就搭这辆顺风车回家看看，结果杨大夫被落下来的房梁夺去了生命。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没了，不久以前她还给我做过产前检查！

他们说，唐山几乎没有留下一件完整的房子了，地震后一片死寂，仿佛人全死光了。杨大夫一家人只剩了他们俩，他们所知道的人几乎都死了。杨再春老师死里逃生，但是没有回来，就像当时所有幸存者一样，义不容辞地留在那里抢救受难者。十几天后杨再春回来时，眼睛血红，神情可怕。他天天和死人打交道，看尽了人间惨状，似乎神经都出了毛病。



余震又来了，每次余震，震级都不小，整个楼都在剧烈摇晃，人们都像惊弓之鸟一样东奔西跑。预报还有更大余震，全体教师和家属都转移到打靶场的带有顶棚的看台上。大田渴了，我给他灌了一瓶白开水，出来得匆忙，什么吃喝都没有带，那刁孩儿尝了一小口，扭头拒绝再喝。教研室的一个老师带了一瓶软包装的果汁，兑了一些在瓶子里，他先用舌尖舔舔，尝出甜味，立刻咬住奶嘴，咣咣咣一口气把水喝光。他的挑剔引起一片欢乐的笑声，给恶劣的环境带来一线生命的阳光。

晚上我们被安置在学校里的一个自行车棚里睡觉。男人们冒着危险回家搬被褥碗筷煤气灶。车棚里并排摆上床板，支上蚊帐，便是一个个的“家”了。我不放心爸爸妈妈，要老宋进城把他们接来，并顺便将儿子的生活用品带回来。宋找到爸妈时，他们在大马路边坐在小板凳上，正无计可施。临走时，妈妈把给我坐月子养的几只鸡送给了院里各家，为的是感谢他们在地震时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

露天住宿真是困难之极，白天又闷又热，没法休息，吃饭幸亏有食堂。我们的煤气罐主要给孩子热奶。妈妈不知道从哪本书上学来的，一瓶牛奶分装在四个奶瓶中，瓶里再兑上水，放在锅里蒸，一天四顿。儿子出生四十多天了，一出生就是这样吃法。地震后他天天拉稀，屎绿绿的，夜里还老哭。眼看他一天天瘦下

去，我们商量的结果是，把他送回贵阳老家去。作出这个决定，我不禁为儿子松一口气，也为自己大大松了一口气。我怕地震，怕得要命。

我们买票十分顺利，排队时人家主动把我们让到前面。本来无论何时火车票都是十分难买的，可是售票员一看我们头上包扎着绷带，立刻卖给了我们卧铺票。在去火车站的汽车上及在火车上，人们都对我们这两个抱着月孩的伤员表现出同情、关心和照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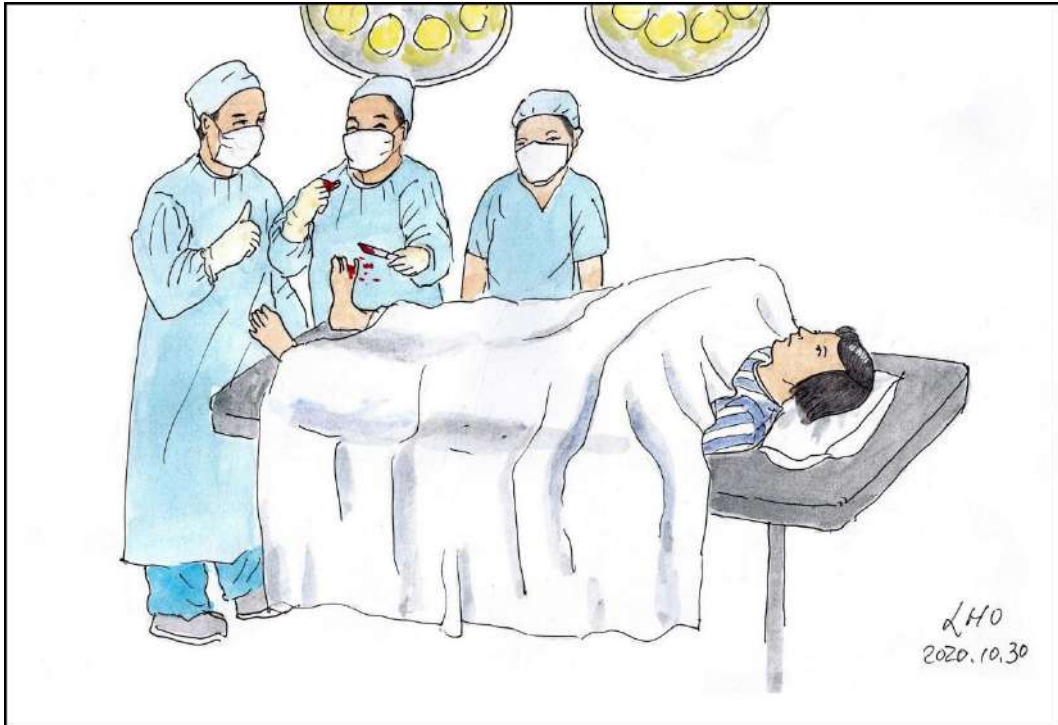


到了贵阳，我们到了安全岛。

我不必每天夜里惊醒，感受地震余震的恐惧，这里也没有不停地政治运动让你精神上无法喘息，没有各种渠道来的政治小道消息让你无所适从。尽管这里的生活比北京艰苦得多，比如用水，各家没有自来水供水系统，要到街上挑水，一条街只有一个水龙头，一大队等待接水的人。挑满一缸水要半天的工夫。好在那时“抓革命，促生产”可有可无，老宋的兄弟姐妹上班很随意，可去可不去。这些工作他们全包了。我们只需在这里安心地养伤、带孩子。

贵阳的牛奶很难搞到，儿子来贵阳后只好吃糕干粉。糕干粉熬得稠稠的，灌满一大瓶子，那小家伙抱着瓶子咕咚咕咚一会儿就喝得精光。吃喝拉撒都正常了，再也不哭不闹，睡得安安稳稳。我这才意识到，在北京他天天拉稀哭闹是因为饿的。

本来的计划是把大田放在奶奶处，我们自己回北京。一天我们去贵定县老宋的妹妹家住了一天，我已经想儿子想得牵肠挂肚，等我们回去，奶奶说大田哭得要死要活，弄得她无措手足，只能陪着掉泪。离回京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一想起要把大田一人留在这个陌生之地，就要哭。老宋看我这么舍不得大田，就说那我们还把他带回去吧。我一下子就浑身轻松起来。但是又不愿马上回去，家里来信说他们仍然在外面住宿，时有余震，能在外面多待就多待些时候。



留下来唯一的办法是找医生开证明。我头上的伤基本好了，但是脚上的伤被忽略了，等我发现时被砸伤的脚趾缝间已经腐烂发臭，清理干净后伤口愈合，但右脚一个脚趾下面肿起一个大疙瘩，一着地就痛。去贵阳人民医院看看能否以此为由多留些时候。照了透视后，莫医生——据说是贵阳有名的骨科医生——说第四趾的骨头被砸碎，又自己生长起来。碎骨被后来长起来的纤维组织包围，长成疙瘩，会永远影响行走。治疗的办法是将该趾割除。我想也不想就同意了。

当我在手术台上头脑清醒地接受着半身麻醉手术，听见那个姓莫的医生在教他的学生如何动这样的手术，边说大家还哈哈地笑，我万分地后悔了，我怀疑这个手术是多余的，医生纯粹是为了让他的实习生做一些临床练习。反过来再想想如果没有这个手术，又哪能得到在贵阳休养生息的机会呢？



贵阳的病房脏乱得可怕。每个病人的家属恨不得把全家都搬来。七大姑八大姨都在病房里转来转去，谈笑哭闹话家常，比菜市场还热闹。家属们甚至搬来了煤炉子，炒菜煮饭如同在自己家里（医院没有饭吃）。护士除了发药打针露一面，根本看不见。老宋和他的妹妹轮流来看着我，主要是送饭和伺候上厕所。十几天后我的绷带拆掉了，少了一个趾头的右脚丑陋不堪。后面的半辈子，一直在下意识地遮掩我的脚，不要暴露在别人面前。

唐山大地震对外报道 7.9 级，但内部盛传是 9.1 级。按官方公布的数字死亡人数 24 万人，民间的数字大大地超过此数（从官方，永远也别想得到真实情况）。中国拒绝了所有国际援手，“自力更生”地抗震救灾，不知道耽误了多少宝贵的生命。

更加荒谬的是，震前国家地震局已经接到大震的预报，却怯于政治风险，没人敢向中央汇报，这件事多年后才被揭发。而我知道最真切的一个例子就在我身边：我们中学有一个刚从海淀第三师范分配来的年轻物理老师，他是地震预测爱好者，并且是海淀区地震预报小组的成员。他天天观测自己制作的地震预报仪器，在地震前两天，准确地测出在两天之内北京东南二百公里将发生特大地震，学校不敢耽误，立即把预测上报区政府，但没人重视这个业余地震预报爱好者的警报。地震发生后，海淀区政府这才梦醒如初，把他捧为英雄，开大会表彰请功颁发奖

状。

顶个屁用啊。

我呢，从那以后健康就开始走下坡路，持续性地头疼，1990年查出脑子里有个三厘米大的脑瘤，西医们在看病时总是要问我脑袋是否受过创伤，中医们更是言之凿凿地断定，这瘤子就是地震那一击造成的。事情还没有完，按照中医人体的辩证法来说，开颅的大手术影响了我机体的平衡，从那以后，病痛不断，大小手术十多次。不过我还是幸运的，想想唐山大地震的遇难者，我的算什么呀。不值一提。



1976年7月6日朱德去世，然后万寿无疆的毛泽东也难违天意。

1976年的9月9日，我正在贵阳的街上走路，忽然听见到满街响起哀乐——毛泽东去世了。看看街上，人们没有什么动静，该干什么还在干什么。有几个女售货员坐在柜台前，把头埋在胳膊里，看上去很悲痛，但是她们没有哭，似乎觉得在同事面前不做出沉痛的表情很说不过去。

几天后天安门开公祭大会。全国上下在那一个时间都同时祭奠。我身穿素色臂带黑箍，还给大田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带了一个小黑箍。当收音机里播送全国军民默哀三分钟时，我认真地低头站着。后来宋家弟兄谈起来当作一个笑话说。现在想起来我自己也不理解当时为什么那么虔诚，我心中的毛泽东还是在神坛上，只不过在晚年时被身边的佞臣架空，一切坏事都是他们做的，并非毛的本意。

我没有哀伤的感觉，只是心情沉重，觉得毛一死，国家一定会乱，当时关于“四人帮”的非议已经四下流传，人心不满。他们会把中国带到什么地方呢。

人们对文化革命已经厌烦透顶。为了挽救文革的末势，收音机和电视里天天大放“文化大革命好”的歌。那歌词已经完全和小孩打架强词夺理一样了：“（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就呕是好！……（喊）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就呕——是好！”唱起来只需声嘶力竭地喊，就行了。就是这样地招魂，文革还是不可避免地在毛泽东寿终正寝后随毛而去。



不久接到克阳的信，带来了惊人的好消息，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北京人载歌载舞地游行庆祝。她特别提到，十几年没见的螃蟹也上市了，人们将三公一母螃蟹提回家把酒言欢，有人特作画“看你横行到几时”。

文化革命终于在全国人民的狂欢中结束了。

等到截趾手术完全恢复，我十一月份才回北京，回到学校，有些老师听说我做了手术，要看我的脚。我脱下鞋袜给他们看了，但是几年后第一次调整工资时，大家对我的意见中有一条就是地震时抱着孩子回老家躲避抗震救灾。没有人提起我头上受的伤，没有人提起我失去一个趾头。人们想到和记住的只是我去了外地几个月“逃避抗震救灾”，而他们则天天在上班，他们吃亏了。📷

【评论】

季羨林笔下的“老佛爷”

——聂元梓的打扮、表现、能力和水平

班道超

季羨林《牛棚杂忆》里说，“我在书中提到的人物很不少的，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有三种情况：不提姓名，只提姓不提名，姓名皆提。前两种目的是为当事人讳，后一种只有一两个人，我认为这种人对社会主义社会危害极大，全名提出，让他永垂不朽，以警来者。”（后记，165）

聂元梓属于第一种，季羨林在书里始终没提聂的姓名，只管她叫“老佛爷”。从他那些极尽辱骂之能事的行文中，人们一眼就看出，他是在说聂元梓。与其说是为当事人讳，不如说是让聂更加臭名远扬，永垂不朽。

季羨林说，“如果我安分守己，老老实实的话，我本可以成为一个逍遥自在的逍遥派，痛痛快快地混上几年的。然而，幸乎？不幸乎？天老爷赋予了我一个犟劲，我敢于仗义执言。如果我身上还有点什么值得称扬的东西的话，那就是这点犟劲。”（《牛棚杂忆》自序，6-7页）这种性格和气质，使他走上了反聂元梓的造反之路。在书里，他列举了反对聂元梓的理由。从文革前的表现，到第一张大字报，再到执掌北大校文革，从个人品质到文化水平、工作作风，季先生都有论述。下面分别述之。

一、关于聂元梓的打扮和表现

季羨林说聂元梓：“此人据说是三八式，也算是一个老干部了，老革命了，但是，调到北大来以后，却表现得并不怎么样，已经是一个老太婆了，却打扮得妖里妖气。她先在经济系担任副系主任，后来又调到哲学系，担任总支书记。”（41页）

聂元梓1921年出生，1960年调到经济系，时年39岁。39岁的女性算不算“老太婆”？聂当时是否“打扮得妖里妖气”？请看樊平的回忆：“我认识聂元

梓还是在六十年代初，她曾多次到我家与我父亲谈系里的工作。在我的印象里，当时的聂元梓，经常身着一袭天蓝色，见人总是面带微笑，很有风度。”（访谈聂元梓，王复兴，2019，134）

关于聂在经济系的表现，聂在回忆录中说：

到经济系以后，我曾想到每一个教授家中去走访一遍，深入地了解情况。系里教师多，不可能每个家庭都走遍，不过我也去过不少人的家。年轻的教师住集体宿舍，我就到宿舍去看他们。如今在经济理论界特别有名的厉以宁，当年是被划成漏网右派的青年教师，我对他同样也是很关心，一视同仁，并重新安排了他的工作，更好的发挥他的专长。那时，他住在海淀街上一个叫老虎洞胡同的平房，到冬天，生个煤炉子，热量不足，房间保暖不好，室内还是很冷。我和他坐在火炉子前面谈过话。他们夫妻两地分居，我曾以组织的名义出面，帮助厉以宁把他远在吉林工作的妻子调到北京来，使他们夫妻团聚，更好地做好教学工作。我在教授中间做思想工作，因为做得比较深入，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信任。总之，我是比较尊重和照顾老教授的。比如说，系主任陈岱荪年纪大一些，为了不让他多跑路，系里有一些会议，我们就到他家里去开。有需要做的工作，需要解决的问题，我经常是先主动和他商量，尊重他的意见，以后再去实行。我告诉陈岱荪，要他放手工作；不要有顾虑，希望他很好地发挥专长。我还深入学生中间，了解情况，学生上课，我也到课堂上听课，随时听取学生的意见。这样了解到的第一手情况，就比较扎实，比较可靠。（聂，2004，74-75）

聂说的是不是事实？樊平的回忆录可资佐证：

陆平非常喜欢用女干部担任系领导，陆平在北大有“五朵金花”是人人皆知的，这五朵金花正是北大最重要的几个系的党总支书记，父亲所在的经济系党总支书记是其中的一朵。陆平的领导艺术是，大事由陆平决定，小事由党总支书记包办。这本也无可厚非，但恰在经济系出了问题。

原经济系党总支书记是个女的，她的领导作风让包括我父亲和张友仁教授（仍在经济学院工作）在内的一些党员群众非常反感。“反右”斗争中她看张友仁

教授不顺眼,千方百计诱导张教授给党提意见。张教授是一个老地下党员,人很正直,不会无原则地把没有的事情说成有,没有中她的计,最后躲过了一劫。

在整风运动时,要求党员向党交心。父亲有多年记日记的习惯,当他把十余本日记主动交到系总支书记时,她向父亲保证,绝不以日记的内容作为处分依据。父亲在一篇日记里写了首《良弓诗》,父亲一直认为他受了许多委曲,在日记里发发牢骚总还是可以的。这首诗最终被拿来作为主要处分依据。总支书记出尔反尔的结果是,父亲受到留党察看处分。

总支书记的生活作风也混乱不堪,甚至影响到系里的工作。她居然想把她的情人提拔成党支部书记。父亲站出来对她的所作所为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她在系里,搞任人唯亲。系里很多同志也都站出来提意见,目的是帮助经济系总支书记改正不良作风,更好地为党工作,并不是要推翻她的领导。

陆平时代的北京大学的领导从上到下,很少自我批评精神。经济系总支书记如能改正自己的做法,事情是很容易解决的,但她没有这样做。陆平看经济系领导不力,就调聂元梓来经济系任副系主任,实际上聂来到经济系不久就成了经济系的实际领导人。

谈到此事时,聂元梓谦虚地说她只是给系里工作提些建议,并说当时的经济系总支书记是个年轻的小女孩,缺乏领导经验,她来只是协助她做工作。

作者与张友仁教授后来都在美国。

张友仁教授谈及聂元梓时,对我和几个也在场的、曾经在经济系工作过的教师们斩钉截铁地说,是聂元梓救了经济系!正是为了感念她在经济系做过的好事,张教授在生活上,给出狱后的聂元梓以很多帮助,当聂元梓需要上医院时,张教授经常派他的私人司机开他的私车接送。

聂元梓在回忆录中写道,为了做好经济系的工作她走访了系里所有的老教授。我亲眼见过,仅我在家时,就见她来过我家两次。她很关心教授们的生活。父亲也经常跟她聊家常,曾为怎样处理我姐姐的婚姻问题请教过她。

当时还是经济系青年教师的厉以宁,正处在人生低潮期。聂元梓鼓励他向前看,使他振作起来。聂元梓还帮助把他的爱人从外地调到北京,解决了他们两地分居的问题。

正是由于聂元梓善待、重用知识分子,使经济系的工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教师们不再人人自危，都在积极努力做好教学工作。聂元梓也因此受到陆平的表扬。不久之后，聂元梓被调到哲学系任总支书记，哲学系原是由陆平的另一朵金花领导的，与经济系同样是问题多多。（同上，135-136）

聂调离经济系时，经济系不愿意放她走，“系里组织了一次游园活动，全系的老师和工作人员一块到颐和园去玩，表示对我的欢送和惜别之情。还昌在同一个校园里，只是从这个系调到那个系，搞这么大的欢送活动，在学校里恐怕是很少见的。那天正好下着蒙蒙细雨，在飘洒的雨丝中，大家的兴致都很高，从万寿石到石舫那边走了一大圈。……回到长廊前的广场上，又在那里摆桌子，开会欢送，气氛很隆重，事先也没有谁告诉我还要开欢送会，只是说到颐和园去玩一玩。我当时很感动。”（聂，2004，77-78）

聂说的是不是事实，有人证——经济系的人还在，有物证——当年聂与经济系教师的合影。

二、关于聂元梓的工作水平和表达能力

季羨林：“我同这个人有过来往，深知她是一点水平都没有的，愚而诈，冥顽而又自大，每次讲话，多少总会出点漏子，闹点笑话。”“在每次开会前，她的忠实信徒都为她捏一把汗。”“不学有术、智商实际上是低能”（41页）

季羨林说聂元梓一点水平都没有。至少会有两种人反对，第一种人是经济系当年的教师员工。他们会告诉季先生：经济系原来是一个老大难的单位，聂元梓来了三年，就把这个乱栏子搞得很好，没有很高的水平这是办不到的。第二种人是当年以陆平为首的校党委，陆平把聂从经济系调到哲学系，把聂从系副主任提升为系总支书，就是因为聂元梓有水平。不但有水平，而且水平不一般。

如果真如季羨林所说，聂一点水平都没有，那就等于说陆平没水平，就等于说经济系的人没水平。换句话说，季羨林是在跟事实叫板，他在无意中向陆平、校党委，向经济系的一众教师员工挑衅。

关于聂元梓是否“愚而诈，冥顽而又自大”这是个比较抽象的问题，咱们后面再说，这里先说具体的——季羨林说聂元梓“每次讲话，多少总会出点漏子，

闹点笑话。”“在每次开会前，她的忠实信徒都为她捏一把汗。”季先生没有举证聂哪次讲话出了漏子，闹了笑话。聂元梓在回忆录中为自己做了举证：

我还在全校的干部和教师大会上做过报告。那时候从上到下都是政治学习多，又赶上六十年代初期的经济困难和党的各项政策的调整，在思想路线和政治宣传方面，都有一些新的提法和做法，因此，人们头脑里疑问比较多。学校党委把学习中反映出来的问题，集中起来，让我给大家讲一次，以解除学习中的困惑，因为我以前学习过经济理论，做过较长时期的党的宣传工作。在北大这样一个专家教授济济一堂的地方做这样的报告，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从经济学的角度，勇敢地提出了我的看法，从实际情况和问题出发，加以理论的说明，我所讲的今天看来也未必全是正确的，可当时的反映都很好。那时候我也比较大胆，我对人民公社就是持否定态度的。我认为人民公社搞早了，没有经过试点就加以推广是错误的，应该是先搞试点，取得经验以后再去推广。我对大跃进也是持否定意见的。我的报告观点很明确，影响比较大，经济系的教授都称赞我讲得好。我的报告做得比较好，和田家英同志有关系。有些理论上的问题曾向他请教过，从他那里受益不少。田家英当时就对左的一套有看法，而且他是主张包产到户的。我的一些观点，受到他的启发。

做过这个报告以后，陆平对我就更重视了。陆平对我一直很好，当初是他把我调来的，对我很关照。我对他也非常感谢。我们关系一直都很好，并且我不仅不辜负他对我的关照把本职工作做好，还关心校内发现有的问题及时反映给他，以便使他将学校的工作做得更好。还有，他和我大哥聂真确实比较熟悉。不过，以前他只是以为我是个“年轻的老革命”，是做实际工作的，没有想到我还有点理论知识。（聂，2004，75-76）

聂的上述讲话的信息，北大校刊上可以查到。聂的回忆录已经出了18年了，没有人否认聂的上述说法。聂当了校文革主任之后，在各种公共场合讲过无数次话。反聂派的小报把聂批得体无完肤，但从来没有提到过聂的哪次讲话出了漏子，闹了笑话。

三、关于聂元梓的职务

季羨林：“那个女人是北大的女皇。此时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完全遵照上面的指示的结果。‘革命委员会好’，这个‘最高指示’一经发出，全国风靡。北大自不能落后，于是那个女人摇身一变成了北大‘合法’政权的头子，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46）。

在这段话里，季羨林犯了三个史实性错误：

第一，文革主体阶段全国的党组织都陷于瘫痪，党员停止活动。在聂元梓主政北大期间，北大没有党组织，聂不可能集党权于一身。⁹³

第二，文革期间，北大先后存在过两个合法的校级领导机构，第一个是中央文革主持成立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1966年9月至1969年9月），聂元梓是这个委员会的主任。⁹⁴第二个是军工宣传队主持成立的“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1969年9月--1978年）。⁹⁵革委会主任是8341的政委杨德中。聂元梓虽然跻身在副主任之中，但处于被审查批判的地位。也就是说，聂只是校文革主任，担任“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是杨德中。

第三，聂的校文革主任是1966年9月北京大学通过巴黎公社式的全民选举选出来的。这其中当然有毛的授意，但也确实是北大绝大多数师生员工的共同愿望。“革命委员会好”的最高指示发表在1967年3月31日。⁹⁶聂当政期间，北大只有“文化革命委员会”，没有“革命委员会”。前者有文化，后者没文化。

⁹³1966年6月4日，张承先为首的北大工作组召开全校党团员干部、学生干部大会，北京新市委负责人吴德做报告，宣布改组北大党委，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二）撤消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大党委进行改组。三）在北大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7月26日，中央文革江青、陈伯达，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等来北大召开大会，宣布撤消张承先的工作组。江青建议聂元梓出面筹建校文革委员会。从此，北大的党组织即陷入瘫痪之中。直至1971年5月，北大召开了第六次党代会，市党委批准了会议选举出的由军工宣队和北大教师干部工人组成的新党委。至此，停摆了近五年的北大党组织才正式恢复。

⁹⁴这个组织名义上存在了三年（1966年9月至1969年9月），实际上仅两年（1966年9月至1968年9月）1968年8月19日军工宣队一进校，就接管了北大的一切权力，聂元梓靠边站，校文革名存实亡。

⁹⁵1969年9月27日，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负责人谢富治及北京一、二机床厂等单位代表出席成立大会。1977年10月，邓小平在教育部关于北大“建立校务委员会，撤销革委会”的报告上批示：“我非常同意。这是一个重要改变，特别请华主席批示。”此后北大革委会名存实亡。但其组织形式和名称在北大一直延续至1978年。就全国而言，地方各级政府的革委会的组织形式和名称是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议案通过后，至1980年代才撤消。

⁹⁶1967年3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论革命的“三结合”》社论，开头引述了毛主席的一段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两者完全是两类不同的机构。搞了一辈子学术，晚年还在谆谆教导人们小心求证的季羨林教授把北大文革的基本史实都搞错了。

晚年的聂元梓有《答季羨林教授》一文，她告诉人们，季羨林先生有很多事都弄错了。“他说我是新北大公社的头头，其实，我没有参加新北大公社，更不是公社的头头。新北大公社有总部有委员，我没有参加这一派。我就是在校文革当主任。还有，他说北大成立了革委会，那是工军宣队进校后的事。当时北大根本没有成立革委会，北大是校文革，校文革就是领导运动，与全国负责学校事务的革委会不同。当时的情况是，‘地派’占优势的学校，都成立了革委会。别的许多高校的革委会，也都成立了。北大该怎么办？我请示过周总理。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参加五一庆祝活动，在天安门上我请示周总理，要不要成立革委会。周总理说，学校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好。我领会周总理的意见，校文革是领导学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至于办学校，将来还要有校长和党委会。”（聂元梓，2014，382页）

在《牛棚杂忆》的后记中，季羨林说：“我只希望被我有形无形提到的人，对我加以谅解，我写的是历史事实。（165页）。📖”

【访谈】

罗征启先生谈“六四”

飞燕采访整理

时间：2013年6月28日

地点：深圳市清华苑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罗征启办公室

采访人：飞燕

燕：网上有关您在深大“六四”期间的记载非常少，少到无法对照查看，有人写过您从四月开始就支持学生的行动，是这样吗？

罗：很严格来讲，我的深圳大学没什么事。有时我跟大家开玩笑，“六四”平反的时候，我还平不了反，因为我没事儿，平什么反？就像清华我们同班同学，他57年划了右派，已经分出去了，在北京市规划局。79年右派改正时，他写信

给我，说听说右派改正了，我这能不能改正？我马上给他回信（他在东北），赶紧给原单位北京市规划局写信，我们从来没有划你右派，怎么给你平反？他说，所有与反右有关的学习和劳改我都参加了。可是规划局说，他们的档案材料里没有我。反右时，规划局是有指标的，当时人数不够，没完成任务，就划了他了。一本书上说，就是四川李井泉一句话，把一批中学生打成了右派，最小的13岁，最大的是抗美援朝回来的。而指标上没有这个13岁的学生。这种错划错打的事“六四”以前就有。

当时深圳大学青年教师中间成立了一个写作小组，写作小组有5、6个人。他们成立写作小组时告诉了我，但他们具体写什么东西，我没管过。他们在89年5月底时，向中央提了一些建议和要求，主要是赶快处理好学生这个问题。当时，他们跟我谈的时候没提这些，因为我们学校一直比较开放，在校内说什么都可以。我跟大家说：“在校内说什么都可以，写什么都可以。出学校，第一别上街。如果你们上街游行我肯定得下来，上边不免我的职，我也要辞职。这次不像胡耀邦下台时那次。那次你们游行了，阻塞交通后出了问题，我替你们挡了，我说这是我没处理好，学生跑街上去了，当时我承担了责任。这次，我告诉你：如果我免了辞了，就承担不了了。所以你们不要上街。另外，你们写什么东西，要注意，事先商量一下。

燕：您是跟写作小组说的？

罗：我是在学生座谈时说的，写作小组的人都在。年轻人爱听年轻人的。年轻老师可以笼住这些学生。有几次，从5月初开始到绝食，从绝食到“六四”出事，几次都是青年教师帮忙，稳住了学生没有出去。后来就是出去了，秩序也非常好，没出什么事儿，而且游行完了还打扫卫生，把垃圾一堆堆地堆好，交待好了才走的。新华社记者看了很感动，深圳市的主要领导，市委副书记秦文俊带着副市长、办公室主任，带着市府一班人到深圳大学来感谢我们。

但是这些官僚，不论是官大的还是官小的，最主要就是保自己。后来，“六四”一出事，他们马上翻脸。他们曾经当着面说，你们秩序很好，你们送的《告全国人民同胞书》，我们已经派人送广东送北京了。我说我没看。

我定的规矩，党员不许上街，青年团干部不许上街，我宣布过好几遍。但他们跟我说，不去不行，万一乱了怎么办？所以，我说党员干部不要去，指挥不能

是团干部，让同学自己选，这样才去上街，结果秩序非常好。比党员团干部组织得还要好。6月4号出事，6月17号叫我去开会，坐一桌子人。秦文俊拿着一张纸，站起来走来走去，走到我们面前，把一张纸甩我面前：“这么反动，这么反动”，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稿子。我没说话。

后来全校开大会，要检查的时候，我就说了：“一个通电，一个《告全国人民同胞书》，我是党委书记，是校长，政治上我负责，我来我承担。后来好多人跟我说，你不必承担责任。我说不是这样，你没有政治经验，我承担不不承担，都得承担，他要整我，不是我承担不不承担的问题，假如我不承担，他们会整学生，会整出个什么集团来，这样更麻烦。我在清华有过这方面的经验，他们下手可狠呢！我不能干那种事。《告全国人民同胞书》是言辞激烈，但是要说反动，能有多反动？他又没喊打倒共产党，没喊不要社会主义，不就是打倒官倒吗？”

“六四”一出事，6月3日，我从上海回到学校，感到有点不对头了，经过广东的时候，广东人游行，这里还好。6月5日市里通知，绝对不许游行，绝对不许上街。很严厉，市里说，不许开追悼会。当时叫动乱。我说你们悼念，就悼念死难的军民，不要只悼念民，不悼念军，把军民对立起来不好。后来开了追悼会，设立了灵堂。

燕：您是有经验教训了。

罗：这次我还宣布了一个口号，“三个保护”。保护好特区投资环境；保护好学校物质精神环境；保护好学生。后来他们又加上了保护好老师。这三个保护比较全面，但是真正做到很难。你想想啊，全国像点样的大学都在停课，都在闹，我们深圳大学，专科一天课没停，一堂课没停。本科在“六四”出事以后，也就停了8天，上半天课。高教厅原定7月初广东省大学英语四级考试，高教厅发个通知征求意见，要求先暂停，明年再考。我们复信要求照考。因为我们是可以照考的。我们的图书馆一天没停，电脑中心没停一天。我们学生什么都是正常的，你说我们动乱，动什么乱啊？

但是，最后他们还是找到了一条，他们说，通电里头有一句是骂邓小平的。骂邓小平什么呢？发电报是通过市局发的。深圳市领导不同意发电报。当时我们学校正在开党代会，我建议大家用个人签名的办法，结果有200多个党员签名，发出去的时候，下面署名是全体共产党员。

燕：全体共产党员有多少人？

罗：有几百。

燕：是通过市公安局，还是市电报局？

罗：是通过市政府，发之前先让市里这帮官僚看了《告全国人民同胞书》，他们没说不同意。但是，后来不认账了。这篇我看到了，作者是谷牧的儿子，挺好的一个人，他说他要写一个。我说你写可以，但你要注意。其实我最大的意见，是党内决定我们中共党员不知道，先跟外国人讲。赵紫阳说的，我们最高领导人是邓小平。他先跟戈尔巴乔夫说，然后出口转内销。

学生写好了以后给我看，非常草的稿子。我说去打印，他们说，打印好了再给你，看个清样。我们深大是民主的，一个东西要发出去，从来不审查，谁发的稿子谁负责就完了。他们打了清样后，有人签了名了，给我留了个地方，当然是第一个，我拿起笔就签了。这句话是什么呢，是“我们不要太上皇”。这句话可能就是6月10号开会提到的那句骂邓小平的话。因为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说过邓小平。如果不是“六四”的话，我对邓小平还没那么大意见。

燕：是不是陈云那个事呢？这么多年了，他还记着呢？

罗：“六四”这么多年了，人家也没忘。去年才发给我护照。2010年才允许我去香港。不过，“六四”也跟外面传媒炒作有关。

燕：外面？境外？

罗：日本都登了。日本的评论说，中共基层党组织像这样逼宫的做法实属罕见。我也收到一个电话，问我：“你干什么反对邓小平？”

燕：这是个什么人？

罗：我没说话，也没问他什么人。

燕：是不是有些人认为邓小平是深圳的恩人？

罗：也可以这么讲吧。都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改革开放不管有多少副作用，邓小平和陈云比起来，还是邓小平开放一些吧。

燕：在本质上是一致。

罗：“六四”发生事情以后，他们用了很多手段，看着我的事，就不说了。

燕：看着您？您是指……在您家盯着？

罗：凡是来我家里的都要问，都要盘问客人。后来王丹第一次服刑后跑深圳

到我家来了。我对他印象还挺好，他说“我很佩服你，我来找你，就是我同意你的看法。我说我什么看法。他说“第一个你反对暴力，同时你又拒绝出国。”当时有好多人都让我出国，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来找我，想让我出去。有个外国人，我认识。外国组织找到他，让他想法把我弄出来，一切工作由他们负责，这个学生只要把我弄出来，上了岸，他们就给这个学生80万美金。

燕：这个外国人是干嘛的？

罗：他是非洲来的，原来在中国学中文。他说80万美金，咱俩一人一半。我说，80万太少了，我才值80万？他说你要多少？我说80亿差不多。一听这话，他就跑了。

罗：了解我的人说，老罗你是失马。我说可以这么讲，假如说，没这事儿的话，我可能还留在深大，做到退休。这样会怎么样？高校现在越来越胡搞。我挺同情南方科技大的朱清时，他是专家、院士，你让他去当校长，让他去组织改革。朱清时上台四年了，他的讲话多极了，接待记者，多极了，从来没提到党的领导，没给党留个地方。我说这怎么行？我是党委书记，我还给党安排个好地儿。我是赞成共产党退出学校的，但我不能这么讲啊。

我到深圳大学时，他让我当书记，没说当校长，我说我不干。两个原因，一是我很想留在清华，但是共产党有一个毛病，你不想去的地方，他一定要你去；你想去的地方，他一定不让你去。我也很想来深圳工作，广东人，很想来广东工作，有点地缘优势，广东话也会讲，广东人我也认识。看风水也说，你的祖宗血脉在南方，你回到南方可以接到地气。你在北方接不上。我说我很想回去，他们三个人都表态，说愿意去。我说了，这个学校你们都说了，这个学校是校长负责制，不是党委领导下的常委负责制，它就是校长负责制，而且那时候只有不到10个党员。我说我做当党委书记做什么？我在清华忙得要死，除了政治思想，还有体育社委员会主任，还有照片社、音乐室。我跑到那儿坐冷板凳去？我不去。

结果马上，广东省高教局一位副局长，一位广东人说，我明白，今天先不谈了。明天我到清华去拜见你，你有时间可以接见吗？我们用家乡话谈谈心。第二天一早跑到清华去：昨天省的常委连夜开会，讨论深圳大学的问题，我反映了你的意见，常委都表示理解，常委的决定，第一请你做深圳大学的第一副校长，明确你主持工作。张维同志年纪大了，临时挂个名，不能长期在这儿。你主持工作，

第一把手将来张维同志退下去，你就是校长。

他们还有一条，省委决定先请你回家乡看看，你愿意留下就留下，不愿意留下还可以商量。讲到这程度，我没办法了。我到深圳看了以后，参加他们的会，开始的时候二十几个人筹备办，开一个会欢迎我们三个人，一个校长一个副校长。开会的时候，张维马上表态，欢迎我来。副校长也表态欢迎。到我表态的时候，我说对不起，大家很辛苦，我来晚了。高教局的人马上打电话给高教局，说老罗同意了，他愿意来。

燕：您说您帮我找的文章，是什么时候写的？（5月23日至26、27日之间。）这篇文章写了之后，您是通过什么途径往上递达的呢？您说青年教师写完就送走了，就是这篇。不是您写的？

罗：不是我写的，我个人写的，就是在网上写过几封信。

燕：当时你们已经在网上了。

罗：我们最先进了，有互联网以后，有人给我说，给你装互联网，跟他们联上，他们上国际的没问题，我们也就跟着上。

燕：也就是说，你们当时是全国最早的局域网？

罗：全国第一个系的专业的电脑中心，建筑系是第一个。事情是这样的，84年，我爱人梁鸿文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去做访问学者，她认识一位搞电脑的老师，叫吴阶强，是个华人，他夫人也是华人。鸿文写信问我，学校要不要搞电脑？我告诉她，学校要搞电脑，但是我们没钱。吴阶强他们要是来深大，他的待遇会比我们的教师好一些。但是，我们没法提供路费。可是人家很高兴。来到深大，排队买饭，在平台上吃。很多人想学英文，深大学生就一起来聊天吃饭，英文进步很快。当时我爱人还没回来，吴先生先来，给我们建筑系建了电脑中心。全中国第一张电脑蓝图是深圳大学出的，不到一年，电脑中心就建成了。

有一个老师是从香港请回来的，他在香港的中国银行工作，香港一家银行有一部电脑不要了，问我们要不要？我们说要，连人带电脑都要。结果没估计到，东西太大，调试，附加很多设备，终端还要弄电脑，房子还是花了不少钱，等到弄好了以后，也过时了。小的电脑出来了。就基本上没用了。

很有意思，各个单位自己搞的，比如说图书馆，我们图书馆是全国第一个全电脑管理图书馆，86年新图书馆建成，87年开始就全电脑了。别的学校做不成，

别的学校书太多了，光把目录输入磁卡，就得用很长时间。我们86、87年，只有10—20万册书。我们学生勤工俭学，很快就搞好了。我们电脑中心，他们就做了一个电脑软件，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个系，用了我们的软件。国内有几个大学，也用这个软件。

燕：您给师生的信，就发在这个局域网上。大致是什么内容？

罗：大致三个高潮，两个大的高潮，第一个高潮，守着守着守着，守不住了。

燕：老师守不住学生了？还是……？

罗：学校守不住了。

燕：是行政守不住了师生了。

罗：实际上是同情学生的，支持学生的，名义上又说大家不许出去，市里要求传达，学生没管住。别的学校都可以原谅，深圳大学就要挨骂。

燕：第一次守不住是在五月的哪一天？

罗：五月中，“426社论”出来之后，闹都是校内，5月15号第一次去游行。学生干部来找我，说罗老师对不起，守不住了。我说不怪你们。第二次，就是戒严，学生闹起来了。本来用不着搞戒严的。有些系号召大家回家闹革命。我就发了封信，大家不要回家闹革命，还是留在学校，把学校守住，减少损失。我们学校又没有围墙。结果学生回来了。第三次是“六四”以后，学校走空了。我们想在10号、11号，“六四”是星期天，5号星期一，8号星期四，发封信让大家赶紧回来上课，恢复正常秩序。我写了一句：我们中国没有民主传统，搞成这样，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大家一定要赶快回来，信发了以后，学生们互相通知，周末都回来，学校就正常了。

燕：您说过，你们学校总共出去了8天半，是这一段吗？

罗：“426社论”到戒严，中间出去过。深圳大学学生比较听话，都用的是星期六和星期天。耽误的8天半是课堂上的。我们学校有个特别的地方，我们这里有很多香港的客人，内地来的客人，中午吃完饭没地儿呆，所以我们把午休取消了。下午早点休息，分两趟班车，有一趟班车没事的你可以走了，有事你坐下一趟班车。5点下班。另外，我们还把星期六改成半天，多出好多时间。这样，腾出的时间就搞党团活动。

我说现在这样是不对的，执政党是特权党，怎么执政党开会能占用工作时间，

占用上课时间？清华明文规定，党支部书记可以减免三分之一的工作量。我说这样不是搞特权吗？深圳有些人，特别是党棍们恨我。恨我提出的“三化”：党的活动业余化，不能占用工作时间；党的干部兼职化，没有全职干部；为党工作义务化。

燕：这不是让党靠边站了吗？

罗：可那个时候党的威信很高。

燕：您这是党内改革派。

罗：有人说我是改革，我声明一下，这不是改革。过去，我们共产党搞地下工作时就是这样的。搞革命工作就是义务化，兼职化。三封信发出去以后，学生就回来了，学校从来没有失控过。

燕：网上尽管介绍得很少，但还是有些不同的地方。如学生所有上街活动都是在校长的支持下。

罗：这怎么说呢？虽然我做好了准备，但不是我开头。

燕：您做好了下台的准备。

罗：第一次是大家走去的，深圳市政府派车送回来的。后来，我说既然他派了车了，以后就这样，我们派车送去，他们派车送回来。送是他送的，他们还到学校去感谢我。

燕：这以后就变成了，您派车把学生送去，他们派车把送回来。这不是达成一种默契了吗？这不是就不堵塞交通了。

罗：市政府也给学生送面包、饼干，吃的喝的。我没钱，我还没送过。

燕：这肯定是426之前。426之后就不敢了吧？

罗：之后也送。深圳市和广东省。最要命的，是到时候他们逃跑了。

燕：我看一些资料，有些市府是投机的。一看戒严，风向变了。

罗：主要是投机。深圳大学干部里头，很难讲，投机没这么严重，逃跑了，吓跑了。比如说，520戒严那天，开全校大会。我去了，还好，也不是太激动，学生代表上去，教师代表上去，温度越来越高。我上去说了几句，还是要保护好学校，三个保护。正在这时候，外头警车响了。一下子气氛很紧张，不知道警车干什么，我站在台上，出去看看情况再说。原来有一个总务处的副处长，不知道哪儿弄了个警车来。他说到游行时我在前面开路，一般人就不管你了。他神通广

大，真是开个警车在前边。人家查他牌子什么都是真的。后来到海南去了。没整他。

“六四”以后他问我：罗老师你怎么考虑？你藏一段可以，你辞职走了也可以。我也有护照，也有去日本的签证，他说你走了也可以。我说不行，我走了就回不回来了。万润南来见着我，问我怎么办，我说不想走。他说他也不想走，走了就回不来了。他说，如果出去只是为自己生活的话，可能生活还好一点。但是不能回来的话，什么作用都没有。

燕：被边缘化了，无法参与，推动不了社会了。

罗：他说，不走要是抓呢？我说假如抓，我们一句话不说，学邓小平，抓不住把柄。最后他们还得把你放了。那是6月7号，他说，我明天到珠海四通看看，可他还是走了。四通周围劝他走的人太多了。四通那些人不知道，以为万润南有本事，出去再办一个公司。他们错了，你变成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谁敢给你办啊。我这样的情形，办这个公司都很麻烦，好多事儿证明都开不出来。

燕：他们海外民运，弄了几年也比较分散，只有做做杂志什么的。

罗：分散了不说，只能开开饭馆。有人去找到万润南，没用。慢慢萎缩了。所以，我觉得情况不是像党媒说的那样，是有系统有预谋的，其实就是有激情和热情。我写信通过中间人告诉他们：千万不要去台湾，千万不要公开骂共产党，千万不要公开地展开民运。

燕：万润南还竞了选呢，他怎么没有啊！

罗：他一上去就没办法了，弄到后来，他坚决退出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燕：他们到了外面，您要求三个不要，他们不可能做到了。您是想保护他，使他们回来还有发展的机会，是这样吗？

罗：他们在外面最好的机会，是老死。死在外边就完了。外边是可以言论自由，但是起不了什么作用。

燕：如果中国不自由的话，他们也没有真正的自由，没有回来的自由。

罗：蒯大富他们，另一派都差不多。

燕：革命群众都差不多。

罗：有蒯大富压沈如槐，他就要千方百计地杀出重围，就要处处小心，因此没犯太大的错误。他们本质上一样的。而且都是在不知不觉地被毛泽东压着，在

一条战船上，什么战船？就是体制外闹革命，推翻现有体制。你要弄明白这点，他们又不承认。但实际上是这么回事儿。所以我在深圳大学，跟他们明白讲，咱们搞改革，是体制内的改革，我先说清楚。体制外没法改，体制外肯定失败。你看中国目前的状况。我挨骂我认了，说我不彻底，怎么说都行。后来我开玩笑，说我是在体制外和体制内的中间走钢丝绳。怎么叫走钢丝绳呢？我比别人革命一点，做得多一点，搞一点改革，如果共产党咳嗽一声，我就回来了。“六四”是怎么回事呢？“六四”是共产党突然大步撤回来了，我被撻在外面了。他们说我也出格了。

燕：没给您定别的性，就说您出格了。出格了算什么？

罗：算什么？你听说过吗？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混蛋和好汉是个界限吗？是矛盾的两面吗？不是啊！现在跟那时候差不多，还是老子英雄儿好汉。

燕：结果这下他撤了，把您撻外边了。撻外边好，干脆您就不回去了，也不用走钢丝了。不能说自由了，但可以大步走了。

罗：是，考虑好了。现在深圳大学还有好多人找我，说怀念过去。说你还回来带我们干。我说我干不了了，我没这个信心，也没这个本事。在体制里能干的事儿，我全干过了，而且基本上干成了。现在他们给毁了，毁了以后我再捡起来重干，我干什么呀我？

燕：您说“他们给毁了”，是指上头给毁了，还是指把深圳大学也给毁了？

罗：深圳大学给毁了，基本上毁掉了。我常说，如果房子炸掉再重新盖一个大学，还让我来盖的话，我也盖不出这么一个深圳大学了，现在人全腐败掉了。当时深圳梁湘那样的人没有了。

我没跟人说过，他们好多人都不知道，在梁湘下来后，生病的时候，人民医院高干楼病房，我和深圳市几个领导去看他。1993年深圳市出了几件事，一是大爆炸，清水河大爆炸，去看他的人中，有一位盛老秘书。梁湘跟我打了个招呼，马上对秘书说，老盛，你去帮我查个事，清水河仓库是不是我批的？如果是我批的，我还得负责任呢。我当时非常感动，我说你病在床上，清水河仓库，他们恨不得脱得跟自己一点关系没有。1993年深圳还发了大水；还有一件是股灾，股灾后的闹事，警察橡胶子弹、催泪弹，催泪弹质量不好炸伤了人。他们说，你好

好养病吧，没你的事儿。清沙河项目是1988、1989年批的，你已经彻底下来了，到海南工作了，跟你没关系。梁湘说：老盛啊，有关系的话，我就得承担，你不能推给别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干得出这个深圳来。如果他不敢担当的话，如果他要是怕人责怪的话，是干不出来深圳的。我们这些比他年轻十几岁的人，觉得他是一个榜样。

燕：您不再跟他们走钢丝了，也不陪着玩跷跷板了，出来就专心做专业了。

罗：深圳市什么也没给我，我算是给深圳立下不少功劳的。他给我解决什么了？职称？工资？待遇？级别？

燕：您有没有社保？医疗保险有吗？

罗：没有。

罗：他们这么说：你要社保可以呀，我们已经说了，你要调到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做副院长。你不去报到。我说你们这么做是害我，我没在这种地方工作过。我一生只在两个单位工作过，一个清华，一个深大。就这两个单位，你们现在把我弄到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人家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他们。我怎么去？我一条汉子，我去跑人家那儿拿养老金去？

燕：等于是找一个单位把您养起来，您也起不了大作用了，就不让您起作用。

罗：我说，在没把我的问题解决之前，我宁愿什么都不要。但我声明：你欠我，你得还我，一分钱都不能差。我该拿多少，你一分钱都不能差。我拿了钱，也许都捐了，也许给困难的人了，这是我的事儿。你现在必须还我。

燕：他们现在是什么事给您弄不清？什么结论把您的问题挂起来了？

罗：他们的结论是这样的：1990年开除我出党，没有文字的东西，文字是到1991年补的。广东省纪委的文件说，经查：罗征启同志在1989动乱期间错误地支持了北京发生的动乱和暴乱，严重违纪党的组织纪律，同意深圳市和深圳大学党组织的意见，开除党籍。这里头写的是深圳市和深圳大学提出来的，我同意了。正式的会，全体深圳市的常委，跟我谈话。

燕：全体常委？跟您一个人谈话？这不跟批斗会差不多吗？

罗：这些我都见过的，工宣队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跟我谈话，我就问李浩，这决定是什么意见？他说老罗，我们所有人都不想这么处理你，这是领导的意见。一会是领导意见，一会是下面提出来的。

我就接受了。他说市里花了很多力量，给你安排一套房子。我说那房子我知道了，我不会上当，我不会去的，他说怎么是上当呢？我说，中央、省、深圳市、省委党组织都三令五申，禁止用公款买商品房给私人用，你们这是干什么？又是公款，又是商品房。我不会上当。很好的房子。我不会要的，你们谁愿意住谁就去住。你等我问题解决了以后，你不给我房子还不行呢。但他们谁都不知道这问题什么时候解决。吃的住的，都我自己解决。你们欠着我，就还欠着我吧。梁湘那一代以后，尤其李浩很差劲，水平相当低，我叫他无耻政客。就是这么嘿嘿嘿地笑，笑了之后，一推。他永远没事儿。第一个买股票的就是他。当时我还在当校长，在人民代表开会的时候，我提了个问题：共产党员能不能买股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头怎么讲的？他们说现在李浩也买了呀。我说，如果以后中央说共产党员不能买股票，怎么办？他们说，不让买，咱再退出来吧。咱们现在跟着李浩买的。买的人多了，就没事了。

燕：法不责众。

罗：是啊，那么多人买，他怎么处理啊？

燕：现在您比谁过得都好。

罗：深圳大学来参观的人一批一批来了好多。他们说老罗，你是个大房地产主。我说这不是我的。他们说，管他名字是谁的，都是你弄起来的，替你高兴。原来我心里也别扭，现在看来老天还是公平的！

燕：什么人都没了信念。

罗：共产党员有什么信念啊？梁湘来看我，说，老罗啊，共产党这是癌症晚期了，怎么办？跟你说声对不起，只能这样了。我们还能有什么办法？我们欠你那么多，每年中秋节还拿你的月饼。我说别这么说。

梁湘那个时候，不是我一个人，深圳市老百姓都比较满意，这就行了。至于我自己，你们都下去了，没人管我，没人问我。虽然我好像倒了霉了，实际上也没倒霉。梁湘当书记的时候说，我有时候羡慕你，有时候嫉妒你，你到处这么多学生，这么多学生对你这么好，做人做到这样行了。你别不满意了。我说，我不满意。这些老同志，还是很阳光的。

燕：他那个比喻打得可真好。

罗：癌症晚期。☞

【述往】

六年芝麻官（二）

——一个县委书记的思考与感悟

李 辅

八、科技促生产 权力推科技

襄汾县是全省农业大县，改革开放前，县委书记主要任务是抓农业，抓粮食生产，解决吃饭问题。襄汾全县九十万亩土地，六十万亩种小麦。如何能使小麦增产丰收？是压在我肩头最重的担子。1974年由于在太原参加批判谢振华，从3月25号开始，开了123天会，回到县里已到了八月初，小麦早已收获入库了。襄汾小麦生产存在什么问题，采取什么措施可以增产丰收？已经不能亲临现场考察了。1975年可不能再失去良机。

1975年从小麦返青开始，每逢下乡我就看看沿路小麦长势。到了五月下旬，我和办公室副主任赵占华骑自行车，自带行李，边走边看，对比分析，看到大面积长势好的小麦，就住在村里，寻他们种麦的经验。看到小麦长得不起眼的地方，也入村住下，走访干部群众，了解失招儿的缘由。经过半个多月“下马观花”，实地调研，初步掌握了全县小麦生产的情况，既有经验，又有问题，可以说是心中有数了。小麦收获后，又有重点地进行回访，掌握确实的数据。后来，召开了多次座谈会，请熟悉农业生产、肯动脑筋的县、社、队干部，发表高见。也多次请教山西农学院在襄汾开门办学的带队老师、小麦专家李焕章教授。经过几个月的准备，一个小麦增广的蓝图已经绘就。又和几个秀才几次研讨、修改写成了一个内容新颖，说理充分，数据论证的报告。依据报告的内容，由农业局、技术推广站和县良种场共同准备了示范、对比试验田。

一切准备就绪，召开了全县四级干部会议。会议主题报告提出，襄汾小麦生产要进行五大革命：种子革命、播种革命、肥料革命、生产条件革命、管理革命。农民习惯和传统非常顽固，守旧抵制革新，保守排斥科学。用“革命”两字，表示决心，并要采取断然措施。用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老品种必须更新为高产稳产的优种。老祖宗使用的耧耩播种深浅不均、稠稀不匀、播幅窄，必须改用播种

机。严重缺磷的土壤必须施用磷肥。深耕、伏耕、扩大水地，改变生产条件。重底肥、早追肥、叶面喷磷、预防干热风、腊黄期收麦等等，都是新的增产的有效措施，都是科研的新成果，是丰产丰收的重要保证。要大面积的推广，一般的宣传、说教效果甚微。必须有力度有震撼有直观、令人信服的措施。大会期间参会人员参观了品种、施肥、播种等多种对比示范，看后思想都有震动，心服口服。

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搭上权力的平台，速度和效果都可达到事半功倍。权力促科技，科技显神威。因为我学过农业，懂得科学技术，所以利用县委书记的权力，积极推广科技，作用和效果就不是科技人员能达到的水平了。1976年襄汾小麦在1975年丰收的基础上，又获得了丰收。两年总产增加了一亿斤，比1974年总产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证明了“五大革命”的正确，也证明了权力促进科技的作用。

1977年秋我下台，1978年《人民日报》有个记者去襄汾采访，写了篇“农民会种地 何必瞎指挥”，没有点名地批判我，算是“肃清四人帮的流毒”。该记者只知道“农民会种地”，当然祖祖辈辈种地，谁也承认“会种地”，但文化较低、信息闭塞的农民不会“科学种田”。毛泽东提出《农业八字宪法》，指示农民要按“水肥土种密保工管”科学种田，当时公社农民没有自主权，对科学种田没有内生动力，县一级领导不亲自传播科学技术，不亲力亲为落实科技措施，特别是打通生产队干部的思想，让其“眼见为实”，任何行之有效的增产措施，都难以大面积推广，落到实处。

九、智对械斗

汾河流经襄汾，沿河两岸有许多村庄，汾河沧桑不定，隔河对岸的村庄间常因争夺滩地，发生矛盾冲突。历史上也有过双方争斗，官方出面裁定，平息冲突。1975年九月，汾河两岸的北靳大队和赵曲的北陈大队又因汛期洪水“倒河”，滩地变化，争执不下，矛盾升级，双方要以武力解决。两个村把拖拉机开到河滩，双方集中精兵强将，手持铁锹棍棒，排开阵势，虎视眈眈，准备决一死战。

情况报告给我，我立即应急处理，派人先到现场，告知双方不要动手，县委要马上介入，书记亲自处理。我到了贾庄公社，通知两个村的主要干部和群众代表到贾庄商谈。首先让双方各自发表他们的主张和理由。上靳村说，滩地以河为

界。北陈村说老祖宗留下的规矩，我们村就是跨河种滩。问他们有什么依据，上靳拿出了土改时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证，北陈村拿出了旧社会的地契。我看了双方的证据后，立马就有了定论。我告诉他们，现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我们当然要维护土改的成果，承认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证，土地证是有效证件。旧社会发的地契在土改后的新社会，失去了法律效力，我们不予承认。

我表明态度后，北陈村的干部和代表再不吭声了。后来，我劝说北陈的干部要做好群众工作，赶快“撤兵”，不要无理蛮干。就这样，看似凶险、一触即发的械斗很快就平息了。在襄汾我还处理过永固和曲沃高显因保滩争滩逼洪引发的枪战。危机处理，我觉得一不要怕，不要躲闪，敢于挺身而出解决问题；二要分清是非，理直气壮支持正确的方面；三是充分说理，以理服人。那个时代，法律很少，缺乏法律的武器，很少依法办事。

十、不如回家卖红薯

“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句话是河南梆子剧中的一句话，是传遍中国的流行语，是人治社会说的话。它到底是县官的誓词，还是老百姓的期望，或者是群众对不作为官僚的咒语，都能说得通。但民主国家，选民决定“官员”去留，是民为官作主，这句话就没有市场。

我们国家是“党治”，党管干部，干部首先要听党的话，对党负责，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所以“为民作主”，是广大群众迫切的愿望。成千上万的“访民”，就是寻找“为民作主”。

人民公社时期，人民很少自由，农民更如农奴，一个队干部就可把一家人置于死地。1975年冬，有一家老小冒着严寒从外地奔波回来，拿着国家信访局和省信访局的公函找我，诉说因得罪了生产队长，扣发了全家口粮，被迫无奈，流浪行乞到了北京、太原，找政府作主，拿回“上方宝剑”，找我解决问题。我同情他们的遭遇，不管有什么矛盾、存在什么问题，有什么理由，也不能断供口粮，总得让人活命啊！我把这一家的情况直接讲给公社书记，交代给他亲自到生产队解决问题，无论如何先供给口粮。

上世纪九十年代，受托到声名鹊起的襄汾肿瘤医院问事，见到一个医师，说他是院长段心爱的哥哥，一见是我，无比热情，称我是他们一家的恩人，没有我，

就没有他们的今天。原来就是我1975年帮助脱困的那家上访户。

1976年基本路线工作队在贾罕公社东（司机王长兴）大队发现了一个被生产队长毒打致瘫的十八九岁的女孩。家里没有父亲，没有靠山。生产队长派工时常常欺负其母女。长期欺压，忍无可忍，在另一次派工歧视时，这个女孩表示不满，与生产队长争吵起来，遭到队长毒打，无钱医治，造成瘫痪，家里失去一个劳力，生活极度困难。我了解这一惨案，首先让民政局给予救济，接着让县民政局和工作队把瘫痪的女孩护送到省城医院救治，但因延误时日太久，医院回天无术，只能对天兴叹！虽然，后来依法惩处了那个行凶的生产队长，讨得一点正义公道，但受害的家庭再也无法恢复原样，直到今日我心中都抱憾难忘！

红卫公社东院大队支部副书记的侄儿在村里当民办教师，多年强奸28个幼女，后因一个女孩怀孕事发，但仍受到包庇，在县委常委会议讨论此案时，有常委还提出判处死刑太重。我在会上说，“若要公道，打个颠倒。如果是自己的亲人被害，是什么的感受态度？”现在说是换位思考，当然判案不能掺杂个人情感，但一个公职人员，总应该站在人民一边，“为民作主”！

“为民作主”是封建色彩浓重的观念，共产党本该为人民服务，不应当“为民作主”。可是人治社会冤假错案常有发生，人民利益被侵犯屡见不鲜，官僚只对上负责不对下，群体性事件有增无减，维稳经费超过国防支出，人民有冤无处申，受害无人管，封建时代产生的“为民作主”反而更加稀贵，讲“党性”又讲“人性”的干部奇缺，老百姓希望“为民作主”的“包青天”，重回人间。

十一、第一次全农会初识邓小平

1975年九月十五日，中央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我作为襄汾县委书记参加了会议。会议先在昔阳县召开，全国二千二百多个县的县委书记参加，省、地委书记全部参加会议。开始的大会，在昔阳县拖拉机厂未完工的大厂房举行，每人发一个马扎，大家都坐在马扎听报告。会议很隆重，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亲自到会并讲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邓小平。邓小平同志在大会开始讲话，没有讲稿，一边抽烟，一边讲话。首先讲形势，说形势大好，形势喜人。说建国二十五年的努力，工业、农业、科学方面都打下了基础。讲农业解决了八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了不起。接着讲我们农村落后，人均产值才一百多元，贵州省只有七十多

元，农村还很穷。全国二千二百个县，有三百个学大寨学得好，如果有三分之一的县学好大寨，粮食就放不下了。小平强调这次会议仅次于七千人大会，意义可能超过七千人大会。小平同志强调学大寨要真学，不要假学，半真半假学。学大寨县委这一级很关键，相当于军队的团一级，既是执行者，又是决策者，要抓好县委班子的建设，选好人掌权。

会上，小平同志讲毛主席说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科学需要整顿，重申了他重新执政后抓的主要工作。小平同志讲话过程中，江青不时插话，小平有时不理，有时顶了回去。说到全国有些地方现在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以前，江青插话，是个别地方。邓小平说个别地方也是不得了的事情，就是个别地方也是值得注意的事！邓小平的讲话很强硬，不容别人置疑，显示出“钢铁公司”的风貌。邓的讲话很随便，但会后细看我的记录，整个讲话，层次分明，逻辑性很强，没有套话、空话，也没有吹捧大寨、昔阳。讲话有水平，旗帜鲜明亮出他整顿治国的方略。

我们在昔阳参观了三天，中央派专列把参会人员从阳泉接到北京。到了北京继续开会，华国锋代表党中央部署在全国开展基本路线教育，要批资本主义，整顿领导班子，解决“五种人”掌权的问题。“五种人”指走资派、民主革命派、老好人和钻进班子里的坏人和阶级异己分子。大会提出要在全国建设一批大寨县。参加这次大会，给县委书记压上一个任务，是学习昔阳经验，建设大寨县：教给的方法是大批资本主义，解决“五种人”掌权。当时，我觉得有了目标，也有了办法。也确实照章办事，很努力地干了两年，也没建成大寨县。改革开放后，全国第一个大寨县昔阳县，一度变成了贫困县。实践证明华国锋代表中央为农村开的这个药方不对症。用“搞阶级斗争”的方法改变不了农村贫穷落后的状况。

十二、涵洞工程的曲折

学习大寨，机关要革命化，干什么呢？去参加昔阳会议前，常委开会决定发动机关干部、厂矿职工把县城的一条洪沟，用石头圈起来。襄汾县城设在汾河岸边，从低处看是一面山坡，由于洪水多年冲刷，在县城东边形成一条很深的洪水沟，把县城一劈两半，只有一个砖砌小桥连接南北两面。

昔阳县学大寨把山沟砌成洞，然后垫土造地。我们一个人口大县，连县政府

眼前的一条沟难道还修不好吗？县委讨论决定，由县委副书记胡文晋分工负责，担任工程总指挥。县委决定给各单位分配任务，到山上开山取石，取石的炸药由县里出钱，其它都要靠自己劳动，特别是要上山拉石头。并规定上冻前必须完成任务。

说干就干，我先以身作则带头干。去昔阳开会前我和县委办公室的同志上山拉了两趟石头。在我赴京开会回来检查此项工作时，纹丝未动。常委会上询问负责工程的胡文晋同志时，讲了缺少经费等许多困难，说县里需投资二三十万元才可以动工。

我听后十分生气。说要花二三十万元还叫什么自力更生，干脆雇人施工算了。从此，看出县委的一些人只会按常规走路。要打破常规干点事情，阻力重重，不是下边不干，领导人就横在路上不让你举步。没办法，我又亲自动员，重新上马。各单位纷纷响应，很快形成声势。尽管由于缺乏技术，有的单位有钱，没有上山拉石头，而是购买青砖，没有完全按照县委原来的要求办事。但是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在上冻前圆满完成了建设任务。一条洪水沟全部建成涵洞，两岸垫平连成一片，方便了市民的生活。后来有许多干部、职工就在涵洞边建起了新房。这一善举，当时群众赞不绝口，赞扬县委为襄汾人民干了一件好事，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做了一项奠基工程。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涵洞还继续发挥着效益。上世纪九十年代，编写县志的人要把这项工程记载在县志上，与历史上汾城县长纪泽蒲修建洪济桥相比美。

十三、南高一蹲点

1975年冬季基本路线教育，我和常委、革委副主任史崇实，在南高一蹲点，赵广业、马国胜分别任工作队正副队长。南高一是个大村大队，全村四千多口人，与北高一村只一路之隔。南高一自然条件很好，“高一”是为了好写，本名是“膏臾”，是土地肥美的地方。因为是要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解决“五种人”掌权的问题，所以工作的着眼点就盯在大队的主要干部。党支部书记赵随流，是个“懒”人，工作懒，劳动更懒。遇事不讲原则，送人情，助邪风，当时认为其“阶级立场有问题”。主任董英基老奸巨猾，是不管事、不得罪人的老好人。这两位都是当了多年的“老干部”，经过运动多了，“油了”，不会真“跟风”

行事，当“左派”了。工作一般化，要说干部的责任，生产没有搞好，当然是错误路线造成的。工作队大会批、小会批，赵随流已经有了对付运动的经验，不吭声也不检讨。搞了几个月也没弄出什么大问题，最后换班子，赵海仙，年轻泼辣、敢干、选拔为支部书记。尉中胜在南高一一直抓打井，发展水利有功，被选为革委主任。群众在运动中出出气，也有心情舒畅的感觉。

换了大队干部，又更新生产队干部。其中有一个生产队长的更换很有戏剧性。这个队的成年人差不多都当过生产队长，工作队也不好确定人选，指定队长，再走过场让群众选举。就决定不演“提线木偶戏”，放手让群众自己挑选称心的队长，搞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过去生产队选干部，人们知道是演戏，不积极参加，这次工作队说要搞真民主，意想不到，群众热情极高，有选举权的社员几乎全部到会参选，生产队办公的地方，挤得满满登登。更想不到的是，绝大多数投票选举了个富裕中农当队长。结果，让工作队很吃惊。看到群众并不讲什么阶级路线，他们选的是能为自己服务的领导。事实也批判了什么“中国老百姓文化低、觉悟低，缺乏民主意识，不能实行民主选举制度”。真实情况，不是老百姓不会民主，而是官方不给民主。

南高一学校的文艺宣传队，有一批少年天才演员，音乐、舞美、编导都很有才华。到县里、地区演出，人人叫好，成了襄汾轰动全县的一支文艺队伍。后来一直演到省城。按现在时髦说法，成为襄汾的一张名片。南高一村学校为啥会出现这样一批人才，有这样一个优秀的宣传队？幕后有一个出众人才臧大海，大海很有才华，因为社会关系问题，走不出去，埋没在农村，因为其学识、聪明，才勉强当了个代课教师。正是大海的努力，培养了许多极富表演才能的学生。而且大海可以编写剧本，能及时把村里、社会上的新人新事搬上舞台。所以从思想内容方面也很吸引观众。改革开放以后，不搞阶级斗争了，大海也解放了。襄汾县委书记史崇实，把大海调到县委，经过一段工作先提拔为办公室副主任，后提为县委办公室主任，最后被选为副县长。一句老话：**以阶级斗争的观点看人，尽敌人；以发展经济的观点看人，尽能人。**从大海坎坷的一生，也能折射出极左路线对人才的摧残！

干部参加劳动，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山西的报纸介绍昔阳县委领导参加劳动，每年坚持一百天。这些宣传，我都信以为真。我身体力行，认真实践，

拼命努力，争取做到。一年到头，在县委机关待的时间很短，往往是一开完会，马上就蹲点大队参加劳动。夏天收麦，头顶骄阳和社员收麦、打麦。春天与社员一起植树，备耕。冬天地里的活不多就参加积肥。在南高一蹲点时，天还不亮就起床和社员一起到牛棚、马圈铲粪垫土，我老老实实以参加两天劳动算一天，就这样千方百计挤时间劳动，1975年一年才劳动了82天。当时苦恼得很，为啥这样一个并不难的革命化措施自己都做不到呢？昔阳县委的干部那样忙，为啥人家能做到呢？我深刻的反思，写了《罪己书》，还以县委的文件通报，未完成全年百天劳动的错误。我学大寨、赶昔阳是十分真诚的。粉碎“四人帮”，昔阳县的问题揭开以后，才知道昔阳县委每年参加百天劳动完全是假的，根本没有做到，是欺骗性宣传。干部参加劳动是假的，连年丰收也是假的，1973年-1977年虚报产量就达二亿七千万斤，昔阳在陈永贵的导演下，演了不少欺骗全国人民的丑剧。所以，中央建设大寨县的部署，也只能以失败告终。

在南高一下乡时，有一个场景和一段言论，记忆深刻，此生难忘。

那年，用风化煤做肥料风行一时。我和工作队的同志与社员一起上西山去拉风化煤。我们拉着小平车，一路走一路聊，有的同志赞扬我不坐小车，和他们一起步走。我说，我当过社员，原来常常步走。当了官有车坐，要想到哪一天下台，还不是照样步走。现在有车步走，将来下台步走，没有失落感。今日在台上，想到日后可能下台。我看到官场“走马灯”，一直记着“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对下台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人治的国家，不知哪个时候、说错哪一句话，得罪哪一个领导，祸从天降。没有准备，后果难料。

十四、美国学者参观丁村遗址

“丁村文化”，是中学历史课本的内容，在国内外很有名气。因为是我们国家自己的专家裴文中、贾兰坡发掘出来的古猿人生活的旧址，意义更不一般，国家考古界十分珍视。“丁村文化”我国专家说是有十万年历史，正好填补了中国考古发现的一段空白。这一学术定论，引起国际学术界的质疑。当时，我们国家鉴定技术落后，拿不出准确的科学鉴定数据。争议引起国际学界的兴趣，美国的学者首先提出要到了丁村考察。

那是1975年秋初，天气还很热。上级通知我们，美国学者要访问丁村，考

察丁村遗址，要求做好接待准备工作。当时，我们一帮土包子，从来没和外国人打过交道，更没和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有过接触。加上上级告知，来的人中有美国情报人员，丁村遗址上的东西，一点也不允许带走。这更加使我们紧张，生怕发生什么失误，给国家造成损失，给中国人丢了脸。我们根据上级的要求，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几次去丁村，勘查现场，敲定来访者的路线图。并对接待的每个细节如接访官员、陪同人员、落脚地址，包括上不上西瓜，都一一请示照办。

本来是一次普通科学考察，我们却如临大敌，心慌害怕。美国学者访问过后，代表襄汾县接访的革委主任深有所感地说，人家美国人很文明，抽烟的人都带有一个小盒子，烟灰和抽后的烟巴子都要装到小盒子里。发生了一桩很丢脸的事是，当美国人登上原来财主大院的二楼远眺遗址地势时，正好一个社员脱裤子拉屎，被美国人抓住拍照，丢了丑！锁国封闭的年代，对外部的世界不了解，和外国人交往，缺乏自信。一个县官在百姓面前也算个人物，一见洋人，就没了底气。阶级斗争的观念，反帝反修的宣传，把美国科学家也看成敌人。现在觉得可笑，可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现状。

就是因为那次接待美国学者的来访，我看了丁村许多巨商大贾建造的深宅大院，建筑规模、建筑艺术比乔家大院一点也不差。可惜土改时分给了贫下中农各家各户，后来由于人口增多，居住不开，把好端端的大院拆毁。如今才知道毁了旅游资源。现在丁村民俗博物馆的那个院子，大庭是县文化馆借用陈列着许多出土的石器，文物专家陶富海向我介绍了房檐上的木雕，完整讲了这家富商在外地发了大财之后，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的壮观场景。如不采取保护措施，这座院子也难以保全。

我听了陶先生的介绍，接受了他的建议，同意由县财政出资，买下了这个大院。为丁村民俗博物馆的开办开了个好头，迈开了第一步。但是，我这个县委书记，尽管是个大学生，脑子里装的全是粮食、棉花，缺少文化，汾城古镇，宝贵的历史遗存很多，当时不断进行建设性破坏，如果我有历史眼光，重视文化建设，汾城古镇和襄汾全县可能会保留下更多有价值的历史建筑。📷

【述往】

看戏的路子

——中国的京剧与欧洲的歌剧

张保和（美）

在早年的北京，看戏一般是指去看京戏，而京戏戏院被称之为戏园子。我家住在王府井北面的迺兹府，和王府井北口的一个专门演京剧的戏园子，吉祥戏院只有几分钟走路之遥。小的时候，我家的阿姨（保姆）徐阿凤经常带着我和弟弟永和去那里看戏。

对于很多戏迷来说，看戏的重点不是看，而是听。所以，人们都不说是去看戏，而是去听戏。在戏园子里，那些戏迷要将眼睛闭起来，不受视觉干扰的专心欣赏音乐，而戏中角色的动作和服装则起码不是重点。

我的挚友程光茂的母亲不但是个戏迷，还是一位票友。程光茂还记得家里有戏服和很多戏折子，即京剧剧本，所以他小时候也受到很多京剧的熏陶。他记得一句老话，“生书熟戏”，意思是听说书，要听新鲜的故事，而听戏，则要听熟悉的剧目。那些戏迷对剧情和戏中的戏词都是滚瓜烂熟了。在听戏时，心里还跟着唱，这样才能进入那种闭起眼睛听戏的出神入化的境界。

据记载，京剧的发展很得益于慈禧太后。因为她特别喜欢看戏，为了取悦她，京剧从剧本，唱腔，动作，道具等等方面都得以长足发展。慈禧太后给京剧留下的另一个痕迹是京剧中的老太太的角色都是正面人物，都是好人。这是因为写剧本时，也要想办法讨慈禧太后的欢心。

对我和我弟这样的不到十岁的孩子来说，京剧的戏词也听不太懂，主要是看热闹，看武打。所以我们几乎就是百分之百的看戏，而不是听戏。文戏中印象较深的是空城计。其中诸葛亮在城楼上对司马懿唱的那一段唱腔，“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我到现在基本上还能记住。诸葛亮在城楼上唱这段戏时，城楼下还有两个画着丑脸的老军在城门前扫地，甚至打盹，极好的烘托了诸葛亮大敌压境但还能沉着应对的智慧和勇气，让我印象深刻。

有一出我们最喜欢看的武戏是挑滑车，其中的主角高宠神勇无比，和金将金

兀术大战，并连挑十几辆铁滑车，最后因战马筋疲力尽，被铁滑车压死，十分壮烈。还有一出特别喜欢的武戏是三岔口，整出戏几乎没有唱，都是打，其中两个杨家将时代的角色，任堂惠、刘利华模拟在黑暗中摸索打斗，特别精彩，让我们百看不腻。

永和一度对京戏非常入迷。可能是因为他是属猴的，永和还特别喜欢孙悟空的猴戏。我们家里有一个两头金色，中间红色的金箍棒，我们经常在家里做一些孙悟空猴戏里的动作。有一次在吉祥看戏时，台上的一个角色做一戏剧性地哈哈大笑，永和看得太投入，情不自禁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也跟着台上的角色哈哈大笑，引起整个剧场的观众哄堂大笑。

他到现在还记得八大锤，打渔杀家等剧目。胡子是从院子邻居宋家借来的。帽子就是一般的棉帽子，倒过来戴。永和至今还记得，胡子有一股味，可能是胡子的原料马鬃的味。除了一些名角外，像胡子这样的道具都是大家共用。可胡子是几乎挨着嘴的，大家共用就不十分卫生了。永和手里的马鞭是我父母给他买的正经的京剧道具。在京剧中，手里拿着一个马鞭，以示骑着马。那马鞭是白色的，上面有很多白色穗子，非常漂亮。价钱也不菲，好像要六、七十块钱，那是当时一个工人两个月的工资。可那马鞭是一件较脆弱的道具，而不是件很皮实的小孩玩具，买回家后不久，就被我和永和玩断了，很可惜。相片上的一个细节是我弟弟拿马鞭的右手的大拇指是翘起来的。这是京剧中拿马鞭的标准姿势，显示永和学得非常到位。那时在东安市场里就有一家京剧道具商店，就在东安市场北门，紧挨着稻香村食品店，和吉祥剧院也是斜对过。因为我家在王府井的北边，每次去东安市场，都是从北门进去，必经那个京剧道具商店。我还记得商店的橱窗里总是陈列着几个京戏里有些角色，像皇帝，皇后，或元帅戴的戏冠，上面镶着各种珠子或金银活，极其漂亮。后来听说，也就是因为这些活，这些冠都特别重。演员将这种冠戴在头上，同时还要唱，表演，甚至做武打动作，特别要劲。

我还曾看过一出梅兰芳演的戏，穆桂英挂帅。那是在1961年人民大会堂的春节晚会里。文革前每年的春节，在人民大会堂都会举行春节晚会，有各种不同的娱乐活动，看戏是其中之一。当然，能去参加晚会的人都是些有头脸的人物，一般老百姓可没份。这个名曰人民大会堂的所在，普通人民根本不能涉足，实在是名不符其实。有一次我们在晚会上还碰到过周恩来总理，他还停下来和我父母

寒暄了几句。我父亲曾在有些工程项目中，如革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等，和周总理有所交集。听说周的记性极好，虽然日理万机，但和他工作过的人都能记得住。看样子是名不虚传。

在我的记忆里，人民大会堂里有两个剧场，一大一小。看戏在小剧场。但即使是小剧场，看戏也还是嫌太大，必须坐在前几排，否则也看不太清楚台上的表演。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毛病：如果碰到不爱看的戏，就会钻到椅子底下躲起来。虽然听还是听得到，现在想起来，可能就是“眼不见为净”吧。记得那天看梅兰芳的戏，因为远，看不清，我又重操故技，钻到了椅子底下。不管我是怎样看的那出戏，到了今天，我应该是为数不多的看过梅兰芳戏的人之一。

大约从 1964 年开始，政治风声越来越紧。我记得我父亲就是在那时被靠边站，没有具体工作做了。在文化上，开始搞破四旧，传统京剧剧目越来越少。到了 1966 年文革正式开始时，传统京剧就全给禁了。对于我个人来说，这倒是省了钻椅子之苦。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是争权夺利。为了权力，人们无所不用其极，这也是人的贪婪本性使然，比较容易理解。对一般老百姓来说，他们和权力斗争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被煽动起来，互相斗争，甚至互相杀戮。这在中外历史上，也比比皆是。

除此之外，文革中的老百姓还被煽动起来去仇恨一切文化。中国是个古老的 国家，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但又一直非常封闭。仇恨外来文化也还可以理解，1900 年的义和团之乱已经有了先例。但在文化革命中，国人也疯狂的仇恨和破坏中国自己的文化。当时的红卫兵甚至把中国文化的老祖宗孔子的坟都扒了。在中国，对某人仇恨的表达莫过于扒其祖坟。而这种扒自己祖坟的行为的背后是什么心态，什么动机？起码对我个人来说，这到现在还是非常费解。连孔子的坟都扒了，京剧当然更不在话下了。除了传统京剧被禁，京剧名角都被残酷迫害，一些甚至被迫害致死，像马连良、盖叫天等。东安市场里的那家京剧道具商店也消失了，那些漂亮的京剧道具的命运恐怕也是凶多吉少。

那个吉祥戏院也是命运坎坷，自 1966 年文革以来，虽然没有完全关门大吉，但到现在也一直在风雨飘摇之中。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但中国传统文化都给禁了，外国文化，像文学、舞蹈、音乐、电影等等，也都被禁了。不过对美的追求也是人性的一部分，即使在文革中，也还没有在所有的人身上丧失。

在 1966 年冬一个星期日的中午，我的一个表嫂，张之俊，请我和永和到她的家里吃饭。那时我的表哥孙大江在外地工作，家里只有她和他们的女儿，孙芳琪。孙芳琪那时大概是六岁。张之俊那时好像也被分配到了外地。因为准备搬家，家里的大部分家具都搬走了，房间里很空荡。张之俊是北洋时期的政府总理段祺瑞的外孙女，本来的上海大小姐。她不太会做饭，那天给我们准备的饭非常简单，就是米饭和用一只鸡炖的一锅鸡汤。虽然简单，当时能有一只鸡吃，也算是很奢侈了。1949 年以前，上海的富家小姐时兴跳芭蕾舞，张之俊也在其列。我记得她曾说过她那时跳得连学都不想上。吃完饭后，张之俊拿出一双芭蕾舞鞋，在空荡的房间里跳起了芭蕾舞。具体跳的什么舞，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她做的几个动作，如站在脚尖上和踢腿等。当然也没有音乐伴奏，舞蹈在寂静中进行。这是我第一次看芭蕾舞。当时大规模的抄家，打人刚刚结束，但文革正是方兴未艾，整个中国笼罩在红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之中。而在北京的一个家中，居然有一个人跳起了芭蕾舞，只有三个小孩作为她的观众。

那时还有两部苏联的老电影，“列宁在 1918”和“列宁在十月”，没有被禁。在“列宁在 1918”里，我记得有一个镜头，描写列宁从一辆火车上下来，从国外回到俄国指挥革命，但没提列宁是从哪里回来的。现在了解到，当时正值一次世界大战，俄国与德国正在激烈交战之中。德国为列宁提供了大量资金，将他从德国送回俄国去通过革命来颠覆俄国的战争努力。交换条件是一旦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掌权，俄国需对德国做出巨大赔偿及割让大量领土。怪不得现在的俄国总统普京称列宁为俄奸。后来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那个俄奸掌了权，俄国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由于信息封锁，当时的中国观众对这段历史真相绝对不得而知。但即使知道，恐怕大家也不会在乎。在那部电影中有一段很短的，恐怕就是十几秒钟的芭蕾舞剧天鹅湖中的小天鹅舞片段，使这部电影极受欢迎。听说有很多人将“列宁在 1918”看了几遍，甚至几十遍，就是为了看这一段小天鹅舞。当时各种形式的外国艺术都被禁了。这段十几秒钟的芭蕾舞成了文革中大家欣赏外国艺术的一个微小的，也可能是仅有的窗口。

文革中，虽然大多数娱乐活动都禁了，还保留了八个所谓的革命样板戏，作为政治宣传之用。但一个像中国这样偌大的国家，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只允许有

八出戏，应该也是在人类近代历史上的一个奇葩的记录。但在另一方面，因为只有这八出戏，人们对每出戏，像在音乐、唱腔、戏词、动作等方面，都下了极大的功夫，可谓精雕细琢。所以很多人认为，那八个革命样板戏尽管是政治宣传，在艺术上还是有一定造诣。但这种充满了谎言的艺术，再精雕细琢，又有什么意思呢？现在知道，纳粹德国是这种精雕细琢的谎言美学的祖师爷，当时那些法西斯宣传片都被拍得尽善尽美。其实苏维埃美学也是半斤八两。到了中国的革命样板戏这里，已经是第三代了。希望今后不再有新一代的谎言美学了，因为每一次谎言美学的出现都伴随着战争，屠杀，政治迫害和无数的灾难。然而将来会发生什么，还真不好说。毕竟作恶也是人性的一部分。

八个革命样板戏之一是沙家浜，一出现代京剧。据说这出戏的唱腔设计很不错。可能因为唱腔好，也可能是因为在十年的期间里一天到晚都在听这么几个调子，直到现在，沙家浜里的某一个唱腔还会忽然从嘴里冒出来。沙家浜里的一个主角，刁德一，是由京剧演员马长礼扮演的，而马长礼是我家的一个好朋友张天民大夫的邻居。通过张天民大夫，我家和马长礼也有些来往。

在八个样板戏中，我最喜欢的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曾经去排长队买票看这部戏。红色娘子军的剧情当然是一个捏造的革命故事，而据说其中的舞蹈和音乐都是模仿俄国的芭蕾舞剧天鹅湖，而且模仿得还不错。所以，这部剧还保留着芭蕾舞的一些音乐，舞蹈的美。一个让红色娘子军很受青年人，尤其是男性青年欢迎的因素是剧中的女演员都穿短裤，露出一部分大腿。体现人体的美本来就是芭蕾舞艺术的一个重要部分，幸好红色娘子军的服装设计还没有革命的太彻底，将女演员们捂得太严实。

大概从八十年代开始，传统京剧被慢慢恢复，但我 1980 年就去了美国，看京戏的机会也就没有了。在大约 1981 年夏，我第一次去洛杉矶的迪斯尼乐园玩。那时，迈克尔杰克逊在那里有一个唱歌及跳舞的节目。我看的那场不是迈克尔杰克逊自己演的，但对我来说，虽然听不懂歌词，那次的表演也还是非常震撼。从音乐到舞蹈，都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没有见到过的，不但新颖，又很好听，好看，又传递一种能量。我看完后，觉得充满了激情。

欧洲的歌剧里没有在京剧里的动作和武打，我从前那种看热闹的看着戏路子当然就不灵了。欣赏欧洲歌剧还就是要像从前的京剧老戏迷一样，去听戏，或者说

是去真正的欣赏音乐。不过听欧洲歌剧比听京剧要更难了。京剧只用一种语言，中文，而欧洲歌剧中常用的语言有好几种，像意大利文、法文或德文等。这当然对歌剧演员的语言要求特别高，他们经常需要掌握多种语言。对听众来说，即使是西方人，懂意、德、法三国语言的人也不多。东方人就更少了。这可能也是歌剧成了阳春白雪的一个原因。一个最普遍的解决方法就是在剧场里或视频上打字幕。另一个途径就是去看剧本，即戏折子。如果对剧情熟悉了及对剧中歌曲的大意都有些了解，也就不一定非要听懂剧中的每句话了。这让我想起前面程光茂提到的那句老话，生书熟戏。看样子，“生书熟戏”这个看戏的路子在看外国歌剧上也还适用。不过因为语言问题，跟着唱不太容易，就只能在心里跟着哼哼了。

我后来对歌剧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变得非常热爱歌剧，尤其是莫扎特的歌剧。莫扎特一生写过六、七个歌剧，都是用德文写的。其中《费加罗的婚礼》，我看过多遍，百看不厌。其剧情是抨击，讽刺贵族的初夜权制度，即对生活在贵族领地上的人们，贵族有在结婚的第一夜拥有他们的妻子的权利。但在莫扎特所在的十八世纪中叶，普鲁士贵族的势利还是非常大，莫扎特不敢直接得罪他们，就移花接木，将把故事搬到了西班牙，让西班牙贵族背黑锅。这种考虑有点像当时写京剧剧本时需考虑慈禧太后的好恶。

费剧的剧情曲折而又幽默，尤其是它的音乐对我来说，更是美不胜收。我在什么地方读到，人类发明了诸多种乐器来帮助创造音乐，但到头来，还是人自己的声音最好听。听了莫扎特的歌剧后，我对这种说法非常认同。莫扎特的歌剧本来都是为一般大众所作，需要诙谐幽默，能逗人乐，所以在刚上演时被认为是下里巴人，不登大雅之堂。可现在成了阳春白雪。这和京剧地位的变迁也颇有些相似之处。

莫扎特（1756~1791）比慈禧太后（1835~1908）要早生近八十年。但感觉上，莫扎特好像很接近现今。这不仅因为他的音乐到现在还非常流行，而且他的生活，他的喜怒哀乐也似乎和现代人相通。而慈禧太后在我的印象里，除了爱看京戏外，她的形象、行为、政策等等，都像是一个比莫扎特老得多的古代人。不知众人是否有同感？虽然在美国，现在想看京戏也非常方便，到“油管”（Youtube）上什么戏都找得到。我现在还是爱看武打的戏。小时候喜欢的那些戏目，像挑滑车或三岔口等，到现在还是看得津津有味。看样子，从小到现在，我对京剧的欣

赏水平没有什么进步。不过如果将来有机会再去北京的戏园子看一次戏，或者说听一次戏，一定会有一些新的感受。起码我是不会再钻到椅子底下了，因为我已经钻不动了。☞

【读者来信】

1. 《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主编补正

去年华忆出版的，由胡宗式和章铎主编主编的《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中)第217页前两行，有一段选自《新北大》第154期的文字：

反党集团干将周景方就对朱成昭说：“你有魄力，与北大这一仗你台子。如果这一仗打输了，我就得到你们学校去避难。”

这段话应为：

确实是有原因的。不过，这位代表当时还不敢明白地说出真实的原因。原来，四月初，反党集团干将周景方就对朱成昭说：“你有魄力，与北大这一仗你得挂帅，谭××是女的，×××也可以，不过软些。”还说：“如果这一仗能打好，你就可以上台了。如果这一仗打输了，我就得到你们学校去避难。”

两位主编特此补正，并向读者致歉。☞

2. 续霜红纠错

胡宗式、章铎主编的《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中)第175页，“劝君更进，西出阳关无故人。”前一句少了“一杯酒”三个字。☞

3. 姜学斋谈《记忆》应该学习罗征启的三个 something

读319专辑，知道罗老师办深圳大学时，全国已经有1067所大学了。如何将深圳大学办出自己特色，罗老师提出三条：要做到 something interesting, something different, something special。他做到了，但也被开除了。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悲哀。但是他提出的三个 something，是值得人们借鉴的。由此想到贵刊，如今各种媒体，滔滔者天下皆是，《记忆》如何办出自己的 something interesting, something different, something special? 值得深长思之。☞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老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成为本刊会员，遵守本刊规定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刊训。遵奉众生平等，百家争鸣之精神，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本刊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方惜辰，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林 洛，信箱：lereve1860@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